

红旗

HONGQI

19

一九六三年



红旗

半月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六三年第十九期 ★

目 录

社論：偉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四周年……………(1)

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嗎？

——三評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人民日报編輯部
红旗杂志編輯部 (5)

南斯拉夫城市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 (7)

资本主义在南斯拉夫农村的泛滥…………… (9)

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經濟蜕化为资本主义經濟…………… (12)

美帝国主义的附庸…………… (16)

美帝国主义的反革命別动队…………… (18)

从无产阶级专政蜕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21)

中共对南斯拉夫問題的原則立場…………… (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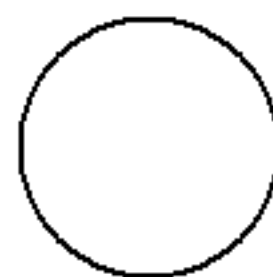
是铁托“勾銷了錯誤”，还是赫魯曉夫以铁托为师呢？…………… (24)

簡短的結語…………… (26)

收获时节訪小平易公社…………… 吳 象 張长珍 姚文錦 (27)

关于发现問題和分析研究…………… 严中平 (34)

☆ 十月一日出版 ☆



——社論——

偉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四周年

偉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已經走过了十四个不平凡的年头。十四年中，任何艰难險阻，都沒有擋住中国人民的英雄步伐。敌人指望我們失敗的預言，一个一个地破灭了。我国人民在旧中国的破烂不堪的地基上，正在建設宏偉的社会主义大厦。

現在，我国人民在克服了連續三年的自然災害所带来的严重困难之后，工农业生产在繼續稳步上升，商品供应量在不断增加，人民的生活在逐步改善。我国的經濟情况一年比一年好，整个国民經濟已經出現全面好轉的局面。乡村、城市，都出現了一片兴旺的新景象。

我国人民在建設社会主义的同时，高举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高举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旗帜，高举保卫世界和平的旗帜，努力加强社会主义陣营的团結，加强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結，坚决地同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作斗争，并且尽自己的一切力量，支持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

全世界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全世界的革命人民，包括偉大的苏联人民，一切爱好和平和正义的人們，对于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設事业中所取得的成就，莫不兴高采烈。

他們說：“中国首先依靠自己的力量、它的人民的劳动，稳步地、耐心地、坚定地向着真正的社会主义前进”。

他們說：“社会主义的确改变了中国，吸引了群众”，“世界上沒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偉大的中国人民沿着他們所选择的道路前进。”

他們高兴的是：“中国的主题歌不再是克服災害了，而是一个重新前进的越来越嘹亮的交响乐。”

全世界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全世界的革命人民，包括偉大的苏联人民，一切爱好和平和正义的人們，都积极支持中国人民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保



卫世界和平的斗争。

他們說：中国人民“希望和平。但是，中国人民深知和平不是光凭禱告和請求就能保卫住的。今天的中国就是靠战胜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才得以进行建設的。”

他們駁斥那些誣蔑中国好战的人說：“我們根本不认为中国是好战的。”

他們說：“社会主义制度根本就不可能怀有侵略意图，而且中国是一个有广大資源的国家，它在忙于开发这些資源。”

他們說：“人民中国真誠信守和平的原則，并且确实具有同怀着同样的和平意願并准备表现出亲善和理智的所有邻国友好相处的願望”。

全世界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全世界的革命人民，包括偉大的苏联人民，一切愛好和平和正义的人們，对于中国人民支持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爭取解放的斗争，給予了很高的評價。

他們說：“中国人民根据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有历史意义的教导，对全世界的工人階級和被压迫者表現忠誠和抱有信心。”

他們說：中国人民是真正在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欧美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从道义上支持，也从物质上支持。中国人民是被压迫人民的朋友。”

所有这一切，都是对于我們党、对于我国人民的一种极大的支持和鼓励。我們衷心感謝全世界一切同志們和朋友們的支持和鼓励。这种支持和鼓励，必将推动我国人民鼓足更大的革命干劲去搞好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設事业，更加坚决地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保卫世界和平，更加忠实地履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义务。同时，也将使我国人民更加謙虛謹慎，进一步加强同全世界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社会主义陣营各国人民、全世界革命人民、全世界一切愛好和平和正义的人們的团結，以增强全世界人民保卫世界和平、爭取人民民主、爭取民族独立和爭取社会主义的力量，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各国反动派。

中国社会主义建設事业中所取得的每一項重大胜利，都是中国人民貫徹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路綫和政策的結果，都是中国劳动人民艰苦奋斗的結果，都是同苏联和社会主义各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分不开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設事业的蓬勃发展，增强着整个社会主义陣营的力量，对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陣营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斗



爭有利，对支持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斗争有利，对保卫世界和平有利。因此，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主持正义、争取进步的各国人民，对我们的成就感到欢欣鼓舞，是可以理解的；另一方面，帝国主义者和它的走狗各国反动派，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感到恼火而肆意进行诬蔑和诅咒，也是不足为怪的。我们曾经看到，帝国主义的统治人物，从杜勒斯、艾森豪威尔到肯尼迪，印度反动派尼赫鲁，叛徒铁托集团，在这方面做得特别起劲。他们曾经不断地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进行恶毒的攻击。当我们连续三年遭受到空前严重的自然灾害的时候，他们更是幸灾乐祸。甚至在我国经济情况已经全面好转以后，他们仍然胡说我国在遭受着“经济衰退”。但是，铁的事实，对于那些颠倒黑白的说谎者，是毫不留情的，在事实面前，说谎者完全破产了。现在，甚至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评论家，也不能不承认“美国关于‘中国越来越走下坡路’的说法”，“完全被推翻了”。

目前，出现的一个新的突出的现象是，由美帝国主义者担任领唱的反华大合唱的成员中，又增加了一些新伙伴。有些自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人，也在学着美帝国主义者的腔调，故意抹煞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无视我国经济全面好转的事实，他们硬说，中国“目前正在经济后退”，中国经济情况的好转“现实没有给予任何依据”，说什么中国人民只喝大锅清水汤，没有裤子穿，等等。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叛徒和帝国主义者联合起来攻击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种现象，早在三十多年以前就已经出现过了。当俄国工人阶级取得革命胜利以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就曾经不断地诬蔑和否定苏联的革命和建设的成就。他们嘲笑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幻想”，是“投机的把戏”；他们多次宣称“集体化已经遭到可耻的失败”。当时，反革命的托洛茨基分子，还有苏联的右派反党集团布哈林、李可夫之流，他们都和帝国主义者唱着一个调子，也大肆攻击以斯大林同志为首的苏共中央的正确政策，硬说苏共中央的政策已使国家濒于灭亡，硬说苏维埃政权一定会灭亡。结果，这些可怜虫的预言都成了历史笑柄。现代修正主义者这样狂热地希望中国经济垮台，看来，他们也想当托洛茨基、布哈林、李可夫式的预言家。

现代修正主义者在歪曲和诬蔑中国的经济情况的同时，最得意的是嘲笑中国人民很穷，因此就看不起中国人民。的确，中国一直到今天，在经济上、文化上还是很落后的。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八年就说过：“除了别的特点之外，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



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①正是因为这样，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有信心，有志气，主要依靠自己的努力，经过长期的斗争，来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逐步把我国建设成为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强大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人民不但决不会向帝国主义和其他什么人乞讨过活，而且完全有信心用自己的双手在中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过愈来愈好的生活。

所有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全世界革命人民都看得很清楚，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艰苦地、忘我地建设社会主义，坚决地主张保卫世界和平，提出并且坚持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现代修正主义者恶毒地攻击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不是由于别的原因，只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揭露了他们对于美帝国主义的投降政策，扯下了他们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衣，使他们推行修正主义的路线变得日益困难了。

在一九一八年，列宁曾经批判叛徒考茨基说：“他们嘲笑社会主义。这是他们的权利。但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居然因为我国在四年大破坏的战争之后有贫农存在（而且还将长期存在）而加以嘲笑，这样的‘社会主义者’只有在叛变之风盛行的环境中才能产生出来。”^②现代修正主义者学着考茨基的样子，对于我国在三年严重自然灾害中一度造成的困难，幸灾乐祸地进行嘲笑。可以说，列宁的这段话也恰恰适用于这些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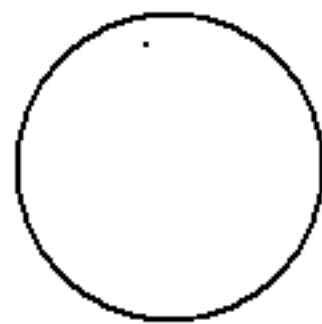
事实已经证明，并且将要继续证明，我们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正确的，我们的大跃进、人民公社是正确的，我们的国内政策是正确的，我们的对外政策是正确的。

中国人民正在意气昂扬地走着社会主义这条伟大的道路，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必将日益繁荣富强！

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万岁！

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世界各国人民的大团结万岁！



① 《介绍一个合作社》，《红旗》1958年第1期。

②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79页。



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嗎？

三評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人民日报編輯部

紅旗杂志編輯部

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嗎？

这个問題，不仅是判断南斯拉夫国家的性质的問題，而且关系到社会主义国家究竟应该走什么道路，是沿着十月革命的道路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还是沿着南斯拉夫的道路实行资本主义复辟。这个問題，也关系到究竟怎样認識铁托集团，它是兄弟党和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叛徒和帝国主义的走狗。

对于这个問題，苏共领导同我們，同全世界一切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存在着根本分歧。

全世界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南斯拉夫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集团，背叛了馬克思列宁主义，背叛了南斯拉夫人民，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叛徒，是帝国主义的走狗。

苏共领导却认为，南斯拉夫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是站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是兄弟党的一員，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

苏共中央七月十四日的公开信，就宣称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并且宣布铁托集团是什么“执掌国家领导权的兄弟党”。

赫魯曉夫同志最近訪問南斯拉夫，发表了許多講話，把过去他們在这个問題上的遮羞布丟得精光，他們的真实观点暴露得更清楚了。

在赫魯曉夫看来，原来南斯拉夫不仅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且还是一个“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在那里，不是“空談革命”，而是“具体建設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发展”是“对总的国际革命工人运动的具体貢獻”，很值得赫魯曉夫羡慕和学习。



在赫魯曉夫看来，原来苏共领导同铁托集团“不仅仅是阶级兄弟”，而且是“由我們所面临的一致目的而联系起来的兄弟”。苏共领导是铁托集团的“可靠的和忠实的同盟者”。

在赫魯曉夫看来，原来他从铁托集团那里找到了真正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說什么“苏共和南共联盟之間在若干原則性的意識形态問題上依然存在着分歧”，不过是装模作样。現在赫魯曉夫对铁托集团說，“我們属于同一个思想，以同一个理論为指南”，都是站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

赫魯曉夫早已把一九六〇年声明拋到九霄云外去了。

声明說：“各国共产党一致譴責国际机会主义的南斯拉夫变种——現代修正主义者的‘理論’的集中表現”。

声明說：“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人背叛了馬克思列宁主义，宣布馬克思列宁主义已經过时，用自己的反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綱領同一九五七年宣言相对抗，把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立起来”。

声明說：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人“依賴美国帝国主义者和和其他帝国主义者的所謂‘援助’，从而使南斯拉夫人民的英勇斗争所取得的革命成果有失去的危險。”

声明說：“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进行着反对社会主义陣营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破坏工作”，“进行着有害于一切爱好和平力量 and 国家的团結的活动”。

声明說得这样清清楚楚，而苏共领导竟然說：“根据一九六〇年声明，我們认为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真亏他們說得出口！

請問：

难道有那么一个像声明所說的，在国际机会主义的变种——現代修正主义“理論”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嗎？

难道有那么一个像声明所說的，背叛馬克思列宁主义、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嗎？

难道有那么一个像声明所說的，进行着反对社会主义陣营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破坏工作的“社会主义国家”嗎？

难道有那么一个像声明所說的，进行着有害于一切爱好和平力量 and 国家的团結的活动的“社会主义国家”嗎？

难道有那么一个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花了几十亿美元豢养的“社会主义国家”嗎？

这真是聞所未聞的咄咄怪事！

看起来，陶里亚蒂同志要比赫魯曉夫同志說得明白一点。陶里亚蒂干脆說，一九六〇年声明对铁托集团所采取的立場是“不正确的”。赫魯曉夫既然一心一意要为铁托集团翻案，就



应该坦白一点，大可不必假心假意、装作维护声明的样子。

声明关于南斯拉夫问题所做的结论，究竟错了没有，该不该推翻呢？陶里亚蒂说：做错了，应该推翻。赫鲁晓夫实际上也是说：做错了，应该推翻。我们说：没有错，绝对不能推翻。一切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维护一九六〇年声明的兄弟党，也都说：没有错，绝对不能推翻。

苏共领导认为，我们这样做，就是坚持“死板的公式”，坚持“资本主义世界的野兽的法律”，是要“把南斯拉夫‘革除’出社会主义”。他们还认为，谁要说南斯拉夫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谁就是“不顾事实”，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而他们闭着眼睛硬说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倒是“从客观规律、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出发”，“对实际情况进行深刻分析”所得出的结论。

南斯拉夫的实际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从客观规律、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出发，对南斯拉夫的实际情况进行深刻的分析，究竟应该得出什么结论呢？

下面我们就来谈谈这个问题。

南斯拉夫城市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

赫鲁晓夫断定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据之一是，南斯拉夫没有私人资本，没有私人企业，没有资本家。

事实果真是这样的吗？不。

事实是，南斯拉夫的私人资本和私人企业是大量存在着，而且在迅速发展。

根据社会主义各国的一般情况，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中，国民经济中存在着多种经济成份，存在着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成份，这种现象并不奇怪。问题在于，国家政权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是采取利用、限制、改造、消灭的政策，还是采取放纵、扶植和鼓励的政策。这是判断这个国家朝社会主义方向发展，还是朝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一个重要根据。

铁托集团在这个问题上是同社会主义背道而驰的。在战后初期南斯拉夫曾经一度实行过的社会改革，本来就是不彻底的。在铁托集团公开叛变以后，他们所采取的政策，不是改造和消灭私人资本和私人企业的政策，而是培植和发展私人资本和私人企业的政策。

一九五三年，铁托集团公布条例，规定“合伙的公民”有权“创办企业”，“雇用劳动力”。同年，铁托集团公布法令，规定私人有权购买国家经济组织的固定资产。

一九五六年，铁托集团从税收政策等方面，鼓励地方政权扶植私人资本。



一九六一年，铁托集团规定，私人有购买外汇的权利。

一九六三年，铁托集团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的政策，又以宪法的形式肯定下来。这个宪法规定，在南斯拉夫，私人可以创办企业，可以雇用劳动力。

在铁托集团扶植下，南斯拉夫的城市私人企业和私人资本像雨后春笋似地发展起来。

据贝尔格莱德官方出版的《一九六三年南斯拉夫统计手册》的材料，南斯拉夫的私人“手工业”已有十一万五千多家。实际上，许多私人企业主并不是什么“手工业者”，而是典型的私人资本家。

铁托集团承认，虽然按照法令，私有者有权最多雇用五名工人，但是有些私有者雇用的工人却高出十倍以至二十倍以上，有的甚至雇用“五百个到六百个工人”。^①有些私人企业每年的流通额，达到一亿第纳尔以上。^②

南斯拉夫《政治报》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七日透露说，这些私人企业主往往还是“大企业主”。“这些私人企业主的网散布得多广，他们拥有多少工人，是很难确定的。按照法律，他们有权雇用五个工人帮助他们工作。但是据熟悉内情的人说，这五个人其实是五个包工头，而这些工头又有一些‘低一级的工头’”。“这些包工头往往是一些不再劳动而只是下命令、订计划，坐着汽车从一个企业到另一个企业并签订合同的人”。

从私人企业主获得的利润，也可以看出他们确实是不折不扣的资本家。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八日南斯拉夫《世界报》说，“某些私人手工业者每月的纯收入达到一百万第纳尔”。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日贝尔格莱德《新闻晚报》说，贝尔格莱德有“一百一十六家私人企业主在去年都获得了超过一千万第纳尔的收入”。有的企业主在一年内“得到了约七千万第纳尔的收入”，按照官价汇率折算，近十万美元。

在南斯拉夫的城市中，不但有私人工业企业，私人服务企业，私人商业，私人房地产业，私人运输业，而且还有被称为“私人银行家”的高利贷者。这些高利贷者公开活动，甚至在报纸上刊登这样的广告：“出借三十万第纳尔，三个月为期，归还四十万第纳尔，需要抵押品。”^③

所有这些，都是无可置辩的事实。

我们要质问那些蓄意为铁托集团翻案的人，你们如果不是存心欺骗，怎么能够硬说南斯拉夫没有私人资本，没有私人企业，没有资本家呢？

① 托多罗维奇：《两条战线的斗争》。见南斯拉夫《我们的实况》杂志，1954年3月号。

② 1961年12月8日南斯拉夫《星期三消息报》。七百五十第纳尔合一美元，三百零三第纳尔约合一元人民币。

③ 1961年12月6日南斯拉夫《星期三消息报》。



資本主义在南斯拉夫农村的泛濫

我們再来看一看南斯拉夫农村的情况吧。

是不是像赫魯曉夫所說的那樣，在那里也已經沒有資本家了呢？

不，事实根本不是这样。

南斯拉夫資本主义的泛濫，在农村中表現得更为明显。

馬克思列宁主义告訴我們，个体經濟，小生产者經濟，每时每地产生資本主义，只有实行农业集体化，才能把农业引上社会主义的道路。

斯大林曾經指出，“列宁說，只要产生資本家和資本主义的个体农民經濟在国内还占优势，資本主义复辟的危險就会存在。显然，只要这种危險还存在，就不能真正地来談社会主义建設在我国的胜利”。（《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卷，第七頁。）

铁托集团在这个問題上采取了同社会主义完全背道而馳的路綫。

本来，南斯拉夫在战后初期曾經实行过土地改革，也組織过一批农民劳动合作社，但是基本上沒有触动富农經濟。

从一九五一年起，铁托集团就公开宣布放棄农业集体化的道路，开始解散农民劳动合作社。这是铁托集团背叛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严重步骤。到一九五三年底，这种合作社由一九五〇年的六千九百多个，縮减到一千二百多个。一九六〇年，又縮减到一百四十七个。南斯拉夫的农村，是个体經濟的汪洋大海。

铁托集团公开說，集体化在南斯拉夫是行不通的。他們恶毒地咒罵“集体化和剝夺是一回事”，^①集体化是一条“最长久地保持农奴制和农民的貧困”的道路。^②他們还荒謬地主張把农业的发展“建立在各种經濟力量自由竞赛的基础上”。^③

铁托集团在解散大批农民劳动合作社的同时，从一九五三年开始，陸續頒布了一系列法令，在农村实行土地自由买卖和自由租賃，实行自由雇工，并且廢除农产品的計划收购制度，实行农产品的自由貿易，鼓励农村資本主义的发展。

在这种政策之下，农村資本主义势力迅速泛濫，农村的两极分化日益加剧。这是铁托集团实行資本主义复辟的一个重要方面。

农村的两极分化，首先表現在土地占有情况的变化。南斯拉夫前农林秘书科馬尔承认：

① 卡德尔：1959年5月5日在南斯拉夫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四届九中全会上的开幕詞。

② 巴卡里奇：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講話。

③ 卡德尔：《关于我国农村政策的若干問題》。見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杂志，1954年第4期。



一九五九年，在农村中，占地五公顷以下的贫苦农户，占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他们拥有的耕地，只占私有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四十三；占地八公顷以上的富裕农户，只占农户总数的百分之十三，他们拥有的耕地，却占私有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三十三。科马尔还承认，每年进行土地买卖的农户，占总农户的百分之十左右。^① 出卖土地的农户，多数是贫苦农户。

土地集中的实际情况，比上面的材料要严重得多。据铁托集团的喉舌《战斗报》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九日透露：在一个县，就有“成千农户拥有大大超过法定最高限额十公顷的土地”。在比耶利纳区，“发现有五百家农户拥有十公顷到三十公顷的田产”。这种情况并不是个别的。

农村的两极分化，还表现在耕畜和农具占有的悬殊。在主要产粮区的伏伊沃丁那省的三十万八千农户中，有百分之五十五没有耕畜。拥有两公顷以下土地的农户，占这个地区总农户的百分之四十点七，但他们的耕犁只占耕犁总数的百分之四点四，平均每二十户才有一张犁。这个地区的富裕农民，不仅拥有大量耕犁和畜力车，还有一千三百多台拖拉机和大量的其他农业机器。^②

农村的两极分化，还表现在雇佣劳动制和其他资本主义剥削形式的发展。

一九五八年二月七日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周报透露，一九五六年，塞尔维亚占地八公顷以上的农户，有百分之五十二使用了雇佣劳动。

一九六二年科马尔说：有些农户的主人近年来“在强大起来，他们不是靠自己的劳动而是靠如下的活动获得收入：非法经商，不仅加工自己的产品、而且加工别人的产品，酿私酒，通过买地或者经常是租地、假分家、侵占或隐匿公有土地等办法，占有超过最高限额十公顷的农地，用各种投机办法购买拖拉机，通过代耕剥削邻近的贫苦农民”。^③

一九六二年八月三十日《战斗报》说：“所谓善良的生产者”，“是租种他人土地、雇用劳动力的人，是有经验的商人”。“这些人不是生产者，而是企业主。他们中间有些人整年都不拿锄头。他们雇用劳动力，而自己只是巡视田间，做做生意。”

在南斯拉夫农村中，高利贷者的活动也十分猖獗，其利息往往在百分之百以上。此外，还有所谓劳动力包买主，利用失业者的困境，从事中间剥削。

大批丧失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贫苦农民，只能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过活。据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日的《政治报》的材料，一九六一年，南斯拉夫全国只有两公顷以下土地的农户的

① 科马尔：《农村和农户的若干问题》。见南斯拉夫《社会主义》杂志，1962年第5期。南斯拉夫农林秘书相当于农林部长。

② 南斯拉夫《指数》杂志，1962年第2期。

③ 科马尔：《农村和农户的若干问题》。



货币收入,大约有百分之七十是靠出卖劳动力获得的。他们遭受重重剥削,过着悲惨的生活。

事实说明,在南斯拉夫的农村中,剥削阶级占据着统治的地位。

苏共中央公开信在辩护南斯拉夫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时候说,南斯拉夫农村的“社会主义成份”已经从百分之六增加到百分之十五。

可惜的是,就连这些可怜的百分比,也并不是社会主义成份。

苏共领导所说的百分之十五的“社会主义成份”,无非是指铁托集团所推行的“农场”和“综合农业劳动者合作社”等农业组织。然而,所谓“农场”,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农场。所谓“综合农业劳动者合作社”,实质上是一种主要从事商业活动的资本主义经济组织。它不但不触动土地私有制,而且它的主要作用就是扶植富农经济的发展。

贝尔格莱德出版的《南斯拉夫农业问题》一书中说:从合作社“今天的情况和它们所起的作用来看,它们丝毫不意味着农业和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与其说它们的作用是在建立农村的社会主义据点,不如说在发展和帮助资本主义因素。有这种情况,这些合作社是富农分子的联合”。

铁托集团给予“综合农业劳动者合作社”向农民收购农产品的垄断权。这种所谓“合作社”在它的商业活动中,凭借这种特权,利用农产品价格自由涨落的条件,大做投机生意,剥削农民。一九五八年南斯拉夫农业减产,“合作社”和其他商业机构就趁机哄抬农产品的销售价格。一九五九年的农业收成有所增加,“合作社”就破坏同农民签订的收购合同,减少收购数量,不惜让农产品烂在地里。

“综合农业劳动者合作社”和“农场”,大量雇用长期的和临时的工人,进行剥削。据一九六二年《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统计年鉴》的材料,一九六一年,仅仅各种“合作社”雇用的固定工人,就有十多万名。此外,还有大量的临时工人。据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一日南斯拉夫《劳动报》透露,雇佣工人“经常受到最粗暴的剥削(劳动日长达十五小时),他们的个人收入通常是十分低微的”。

由此可见,这些所谓“社会主义成份”的农业组织,都只不过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农业组织。

剥夺贫苦农民,发展资本主义农场,这是铁托集团在农业方面的基本政策。铁托在一九五五年就说过:“我们并不放弃在南斯拉夫有一天将以某种方式把小农庄合并起来……。在美国已经这样做了。我们必须设法解决这个问题。”

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一九五九年,铁托集团制定了“农地使用法”,个体农民如果不能按照规定的条件使用土地,就由“综合农业劳动者合作社”或“农场”对他们的土地实行“强制管理”。这实际上是用剥夺贫苦农民,强制兼并土地的办法,来发展资本主义农场。这是道道地地的农业资本主义道路。



斯大林在谈到小农经济向大的农业经济过渡的时候说：“这里有两条道路：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向前走到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向后退到资本主义的道路”。

除了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外，还有没有第三条道路呢？斯大林说：“所谓第三条道路，其实就是第二条道路，就是回到资本主义去的道路”。“因为：回到个体经济去和恢复富农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恢复富农盘剥，恢复富农对农民的剥削，使富农有权势。但是，能不能恢复富农而同时又保持苏维埃政权呢？不，不能。恢复富农的结果必然是成立富农政权而取消苏维埃政权，因而，必然是成立资产阶级政府。成立资产阶级政府的结果又必然是恢复地主和资本家，恢复资本主义。”（《斯大林全集》第十三卷，第二百一十七页。）

十几年来南斯拉夫农业的道路，正是这样一条恢复资本主义的道路。

所有这些，都是无可置疑的事实。

我们要质问那些蓄意为铁托集团翻案的人，你们如果不是存心欺骗，怎么能够硬说南斯拉夫没有资本家呢？

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蜕化为资本主义经济

南斯拉夫资本主义的复辟，不仅仅表现在城市私人资本主义和农村资本主义的泛滥。更重要的是，在南斯拉夫经济中占决定性地位的“国营”企业，已经蜕化变质了。

铁托集团的所谓“工人自治”的经济，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国家资本主义。这种国家资本主义，不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而是铁托集团把无产阶级专政蜕化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这些“工人自治”企业的生产资料，不是归某一个或者某几个私人资本家所有，而实际上是归以铁托集团为代表的包括官僚、经理在内的南斯拉夫新型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所有。这个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盗用了国家的名义，依附美帝国主义，披着“社会主义”的外衣，霸占了原来属于劳动人民的财产。所谓“工人自治”制度，实际上是处于官僚买办资本统治之下的一种残酷的剥削制度。

从一九五〇年起，铁托集团就公布一系列法令，规定工厂、矿山、交通运输、贸易、农业、林业、公用事业等所有国营企业，都实行所谓“工人自治”。这种所谓“工人自治”的主要内容就是把企业交给所谓“劳动集体”自行管理，由各企业自己采购原料，决定产品的品种、产量和价格，自己到市场上推销产品，自己决定工资，自己决定一部分利润的分配。南斯拉夫法令还规定，企业有权自行买卖和租赁固定资产。

铁托集团把所谓“工人自治”企业的所有制，叫做是什么“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更高形式”。他们说，只有实行“工人自治”，才是“真正地建设社会主义”。



这完全是骗人的鬼话。

从理论上说，稍有马克思主义常识的人都知道，所谓“工人自治”、“工厂归工人”这一类口号，从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口号，而是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口号，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老机会主义者、老修正主义者的口号。

所谓“工人自治”、“工厂归工人”的“理论”，同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完全背道而驰的。这一类“理论”，也早已被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驳得体无完肤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无产阶级运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所有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首先把生产资料转化为国有财产”。

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必须把生产资料集中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手中。这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

在十月革命以后，苏维埃政权的初期，当有人主张把工厂交给“生产者”直接“组织生产”的时候，列宁曾经严厉地批评这种主张，指出这种主张的实质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任何直接或间接地把个别工厂或个别行业的工人对他们各自的生的所有权合法化、或者把他们削弱或阻挠执行全国政权的命令的权利合法化的做法，都是对苏维埃政权基本原则的极大歪曲和完全放弃社会主义。”（列宁：《关于苏维埃政权的民主制和社会主义性质》）

可见，所谓“工人自治”根本不是社会主义。

其实，铁托集团的所谓“工人自治”，也并不是真的让工人来“自治”，而是一个骗人的幌子。

实行“工人自治”的企业，实际上是掌握在以铁托集团为代表的新型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手中。铁托集团控制了企业的财权和人权，拿走了企业收入的绝大部分。

铁托集团通过银行控制全国的信贷，控制各企业的投资基金和流动资金，监督各企业的财务。

铁托集团通过税收和利息等渠道，攫取各企业的收入。据《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一九六一年工作报告》的材料计算，他们用这种方式，拿走了企业的纯收入的四分之三左右。

铁托集团掠夺人民的劳动果实，主要是用于他们这个官僚集团的挥霍，用于维持它们的反动统治，用于加强对劳动人民的镇压机器，用于通过归还外债和支付外债利息的形式向帝国主义交纳贡款。

铁托集团还通过经理来控制企业。这些企业的经理，名义上由企业招聘，实际上是铁托



集团任命的。他们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在这些企业的代理人。

在这些所谓“工人自治”的企业内部，经理同工人的关系实际上是雇佣同被雇佣、剥削同被剥削的关系。

实际情况是，经理有权决定企业的生产计划和经营方向，有权处理生产资料，有权决定企业收入的分配，有权招收工人和解雇工人，并且有权否决“工人委员会”或“管理委员会”的决议。

南斯拉夫报刊反映的大量材料证明，“工人委员会”只是一个徒具形式的“举手机器”，企业的“一切权力都操在经理手中”。

由于经理掌握和支配生产资料，并且掌握和支配企业收入的分配，这就使他们可以利用种种特权，侵占工人的劳动成果。

铁托集团自己也承认，在这些企业中，经理同工人之间不但工资悬殊，而且分红悬殊。有些企业，经理和高级职员分得的红利比工人高四十倍。“在某些企业中，一些领导人员领到的奖金总额，竟等于整个集体的工资总额”。^①

企业经理还利用特权，巧立名目，取得大量收入。接受贿赂，贪污盗窃，更是企业经理的一项大财源。

广大工人的生活是贫困的。工人的就业没有保障。大批工人因为企业倒闭而失业。据官方统计，一九六三年二月失业者的人数达三十三万九千人，相当于在业总人数的百分之十左右。每年还有大量工人流亡国外。

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五日南斯拉夫《政治报》承认：“在某些工人和职员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鸿沟，前者把后者看作‘吞掉’他们工资的‘官僚’”。

这些事实表明，在南斯拉夫的所谓“工人自治”的企业中，形成了一个少数人占有多数人劳动成果的新的社会集团，它是新产生的南斯拉夫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一个重要部分。

铁托集团推行所谓“工人自治”，使原来属于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完全脱离了社会主义经济的轨道。

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取消国家统一的经济计划。

第二，把利润作为刺激企业经营积极性的根本手段。企业为了增加收入和利润，可以自行采取各种办法。这就是说，所谓“工人自治”企业的生产目的，根本不是为了满足社会的需要，而是像资本主义企业一样，是为了追求利润。

^① 1953年2月17日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给各级组织和领导的公开信。



第三，实行鼓励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政策。铁托对企业经理说，“进行竞争将有利于我们的普通人、消费者”。铁托集团还公开说，他们所以允许“竞争、追逐利润和投机倒把等现象”，正是因为“对发扬生产者及其集体和公社等的主动精神起了积极作用”。①

第四，把信贷和银行作为支持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的重要杠杆。铁托政权的信贷和银行机构采取招标的办法，投放贷款。谁有偿付能力，谁出的利息高，偿付快，谁就得到贷款。用他们的话说，这就是“把竞争作为常用的分配投资贷款的方法”。②

第五，各企业之间的关系，不是在国家统一计划下的互相支援、互相协作的社会主义关系，而是在自由市场中互相竞争、互相倾轧的资本主义关系。

所有这些，都从根本上破坏了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

列宁说过：“没有国家的有计划的组织，使千百万人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中最严格地遵守统一的准则，社会主义就无从设想。”（《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三百一十四页。）

列宁还说过：“如果对于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不实行全面的国家统计和监督，那么劳动者的政权、劳动者的自由，就不能维持下去，资本主义压迫制度的复辟，就不可避免。”（《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二百三十二页。）

在“工人自治”的招牌之下，南斯拉夫各经济部门和各企业之间充满着资本主义式的激烈竞争。所谓“工人自治”企业为了在市场上打击竞争对手，为了追求利润，营私舞弊，投机倒把，囤积居奇，哄抬物价，贪污行贿，封锁技术秘密，争夺技术人员，甚至利用报纸和电台互相攻讦，已是司空见惯的了。

不仅在国内市场上，而且在对外贸易方面，南斯拉夫企业之间，也进行着激烈的竞争。南斯拉夫报刊说，常常是二、三十个南斯拉夫外贸企业的代表来到同一个外国市场上，彼此抢生意，争夺交易对手。这些外贸企业，“由于自私的原因”，“不择手段”和“不惜一切代价地赚钱”。

由于激烈的竞争，南斯拉夫的市场极为混乱。不仅各个城市和地区之间，即使同一个地方的各个商店之间，甚至从同一个生产单位买来的同一类货物，价格也有很大差别。为了保持高价，有些企业不惜把大批农产品毁坏掉。

由于激烈的竞争，南斯拉夫有大批企业倒闭。据《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公报》的材料，近几年来倒闭的企业每年都有五、六百家。

所有这些都说明，南斯拉夫的“国营”经济，不是受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规律支配的经济，而是受资本主义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规律支配的经济。铁托集团的所谓“工人自治”企业，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而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

① 巴卡里奇：1959年4月7日在克罗地亚共产主义者联盟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② 帕皮奇：《南斯拉夫的投资拨款》。见《集体经济年鉴》，1959年4月—11月号，贝尔格莱德印行。



我們要質問那些蓄意为铁托集团翻案的人，你們如果不是存心欺騙，怎么能够硬把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控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經濟，說成是什么社会主义經濟呢？

美帝国主义的附庸

資本主义在南斯拉夫复辟的过程，是同铁托集团投靠美帝国主义的过程，同南斯拉夫淪为美帝国主义的附庸的过程，交織在一起的。

铁托集团背叛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就走上了出卖国家主权，依靠美帝国主义的施舍过日子的可耻道路。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到一九六三年一月，据不完全统计，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給铁托集团的各种“援助”，总共約五十四亿六千万美元。其中，美国的“援助”占百分之六十以上，約有三十五亿美元。这些美援的絕大部分是在一九五〇年以后給的。

美援是南斯拉夫財政經濟的支柱。根据官方材料統計，一九六一年，铁托集团从美国和美国控制的国际金融組織得到的貸款，共計三亿四千六百多万美元，相当于当年南斯拉夫联邦預算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七点四。如果把其他西方国家的援款包括在內，那么一九六一年铁托集团从所有西方国家得到的援款，共計四亿九千三百多万美元，相当于当年南斯拉夫联邦預算收入的百分之六十七点六。

为了取得美援，铁托集团同美国締結了一連串卖国条約。

一九五一年南斯拉夫同美国关于“共同防禦援助协定”的換文規定，美国政府官員可以“自由地并毫无限制地”在南斯拉夫境內，对美国軍援物資收受和分配情况进行視察和监督，并有“充分获得交通和情报方便”的权利。这个协定还規定南斯拉夫必須向美国提供战略原料。

一九五一年南斯拉夫和美国“軍事援助协定”規定，南斯拉夫要对“自由世界的防禦力量作出最大的貢獻”，要准备向联合国提供軍隊。美国根据协定派出的軍事使团，直接監督訓練南斯拉夫軍隊。

一九五二年南斯拉夫和美国的“經濟合作协定”規定，南斯拉夫必須把美援用于“促进个人的基本人权、自由和民主制度”，換句話說，就是促进資本主义制度。

一九五四年，南斯拉夫同北大西洋集团成員国希腊和土耳其締結同盟政治合作和互相援助条約，規定这三个国家在軍事上和外交上互相配合，事实上使南斯拉夫成为美国控制的軍事集团的成員。

一九五四年以后，南斯拉夫又同美国簽訂一系列出卖主权的协定，仅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二年，就有五十多个协定。



由于签订了这些条约和协定，由于铁托集团使南斯拉夫依附于美帝国主义，美国取得了：

- (一) 控制南斯拉夫军事的权利；
- (二) 控制南斯拉夫外交的权利；
- (三) 干涉南斯拉夫内政的权利；
- (四) 支配和监督南斯拉夫财政金融的权利；
- (五) 控制南斯拉夫对外贸易的权利；
- (六) 掠夺南斯拉夫战略物资的权利；
- (七) 在南斯拉夫猎取军事和经济情报的权利。

南斯拉夫的独立主权，就这样地被铁托集团实行了大拍卖。

为了取得美援，铁托集团除了同美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出卖国家主权以外，还在对内对外政策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步骤，适应西方垄断资本侵入南斯拉夫的要求。

从一九五〇年开始，铁托集团就取消了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制。

一九五三年颁布《外贸经营法令》，允许企业独立经营对外贸易，允许企业直接和西方垄断资本企业进行贸易。

一九六一年，铁托政权又实行了一次外汇外贸制度的“改革”。这次改革的主要内容，是进一步放宽进出口的限制。对于重要的再加工材料和若干消费品的进口实行“完全自由化”，并且，在不同程度上放宽其他商品的进口限制。对于所谓自由进口的商品所需要的外汇，可以无限制地供应。

大家知道，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制，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列宁说：“工业无产阶级如果没有工业保护是绝对不能恢复我国的工业、使俄国成为工业国的；这里的工业保护指的只是对外贸易垄断制，决不是什么关税政策。”（《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第四百一十五页。）

斯大林说：“对外贸易垄断制是苏维埃政府的政纲不可动摇的基础之一”，取消对外贸易垄断制，“就是放弃国家工业化”，“就是让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充斥苏联市场”，“就是使我国由独立的国家变成半殖民地的国家”。（《斯大林全集》第十卷，第九十八、九十九页。）

铁托政权取消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制，就是向帝国主义的垄断资本大开门户。

铁托集团接受大量美援，向帝国主义大开门户，在经济上的后果是什么呢？

第一，南斯拉夫变成了帝国主义的倾销市场。

帝国主义国家的大量工业品和农业品涌进了南斯拉夫的市场。为外国垄断资本服务而大发横财的南斯拉夫买办资本家们，为了追逐私利，对于国内能够生产、甚至有大量库存的商品也源源进口。一九六一年七月二十五日《政治报》承认，“随处都能发现”南斯拉夫工业“正



处在外国工业的不断的和非常复杂的竞争的打击下”。

第二，南斯拉夫变成了帝国主义的投資場所。

南斯拉夫的工业企业，许多是靠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援助”建立起来的。许多外国的私人垄断资本直接打入了南斯拉夫。南斯拉夫国家投资银行总经理帕皮奇说，在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六年这段期间，“国外资金的参加，达到经济投资总额的百分之三十二点五”。美国国务卿腊斯克一九六二年二月五日说，南斯拉夫的资金“大部分都来自西方”。

第三，南斯拉夫变成了帝国主义的原料基地。

从一九五一年开始，铁托集团就根据美南“军事援助协定”，源源不断地供给美国大量战略原料。据一九六一年《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统计年鉴》的材料，一九五七年以来，南斯拉夫出口的镁、铅、锌、锡等重要矿产，有一半左右输往美国。

第四，南斯拉夫的工业企业变成了西方垄断资本企业的装配车间。

南斯拉夫很多重要工业，都是按照西方国家的许可证，依靠进口再加工材料、零件、部件和半成品来进行生产的。这些工业企业的生产，处在西方垄断资本企业支配之下。

事实上，南斯拉夫的许多工业产品，是从国外进口现成的零件，加以装配，然后贴上自己的商标，当作自己的产品出售的。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南斯拉夫《星期三消息报》说，“我们某些工业部门开始变为特种商业组织，它们不是进行生产，而是进行安装，仅仅把自己的商标贴在他人的产品上。”

在这种情况下，南斯拉夫就成为西方垄断资本的世界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南斯拉夫不论在财政经济等各方面，都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结成不解之缘，沦为帝国主义的附庸，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附庸。

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出卖自己的独立主权，依附于帝国主义，这就不可避免要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复辟。

铁托集团宣扬的所谓依靠美援建设“社会主义”的独特道路，并不是别的，就是按照帝国主义的需要，把社会主义制度改变为资本主义制度的道路，就是从独立国沦为半殖民地的道路。

对于这样一个美帝国主义的附庸，赫鲁晓夫竟然还说它是在“建设社会主义”。这真是海外奇谈。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批判过的各色各样的假社会主义之外，又增加了这样一个贴着美援商标的所谓社会主义的新品种。这大概是铁托和赫鲁晓夫“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伟大贡献”吧。

美帝国主义的反革命别动队

从铁托集团在国际关系中所起的反革命作用来看，从铁托集团所执行的反动的对外政策来看，南斯拉夫更加谈不上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在国际舞台上，铁托集团是美帝国主义破坏世界革命的别动队。

铁托集团用资本主义在南斯拉夫复辟的实例，帮助美帝国主义向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政策。

铁托集团打着社会主义国家的招牌，疯狂地反对社会主义阵营，破坏社会主义阵营，充当反华的急先锋。

铁托集团打着“不结盟”和“积极共处”的幌子，破坏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为美国新殖民主义效劳。

铁托集团极力美化美帝国主义，麻痹全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斗争。

铁托集团打着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招牌，到处推销他们的修正主义毒素，反对各国人民的革命。

在十几年来世界上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国际事件中，铁托集团总是扮演着美帝国主义走狗的角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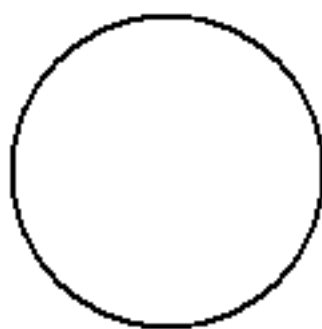
第一件：希腊革命。一九四九年七月十日，铁托宣布对希腊人民游击队封锁南希边境。同时，却让希腊保皇法西斯军队通过南斯拉夫领土，从背后打击希腊人民游击队。铁托集团就这样帮助美英帝国主义扼杀了希腊人民革命。

第二件：朝鲜战争。一九五〇年九月六日，当时的外交部长卡德尔发表声明，公然诬蔑朝鲜人民反侵略的正义战争，为美帝国主义辩护。十二月一日，铁托集团代表在安理会发言，攻击中国“积极干涉了朝鲜战争”。铁托集团并且在联合国投票赞成对中国和朝鲜“禁运”。

第三件：越南人民解放战争。一九五四年四月，讨论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召开前夕，铁托集团极力诬蔑越南人民的正义斗争，说什么莫斯科和北京把越南人民“作为自己在战后冷战政策中的一张牌”。他们把越南人民解放奠边府的伟大战役，说成“不是善意的姿态”。

第四件：对阿尔巴尼亚的颠覆活动。长期以来，铁托集团对社会主义的阿尔巴尼亚，一直进行颠覆活动和武装挑衅活动。他们先后在一九四四年、一九四八年、一九五六年、一九六〇年，制造了四次重大的叛国案件。铁托集团在阿南边境所进行的武装挑衅活动，从一九四八年到一九五八年，达四百七十多次。一九六〇年，铁托集团和希腊反动派，配合美国在地中海的第六舰队，策划过一次对阿尔巴尼亚的武装进攻。

第五件：匈牙利反革命暴乱。铁托集团在一九五六年十月匈牙利反革命暴乱事件中，扮演了干涉者和挑拨者的可耻角色。在反革命暴乱发生以后，铁托发表一封信，支持叛徒纳吉的各项反革命措施。十一月三日，铁托集团通知纳吉到南斯拉夫驻匈牙利使馆避难。十一月十一日，铁托发表讲话，说反革命叛乱是“进步分子”的反抗，狂妄地提出是“南斯拉夫路线”得胜，还是“斯大林主义路线”得胜的问题。



第六件：中东事件。一九五八年，美帝国主义出兵侵占黎巴嫩，英帝国主义出兵侵占约旦，全世界掀起了巨大的抗议浪潮，要求美英军队立即撤走。南斯拉夫外交国务秘书科查·波波维奇，在联合国大会讨论中东局势的紧急会议上说：“问题不在于坚持谴责或赞同美国和英国所采取的行动”。他还主张由美帝国主义操纵下的联合国进行干涉。

第七件：台湾海峡事件。一九五八年秋，中国人民解放军为了打击美帝国主义在台湾海峡的挑衅活动，惩罚美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匪帮，炮击金门。铁托集团把中国的正义斗争诬蔑为“对全世界的威胁”，“有害于和平”。

第八件：U—2飞机事件。一九六〇年美国派遣U—2间谍飞机侵犯苏联，破坏巴黎四国首脑会议。铁托在五月十七日发表声明，攻击苏联政府当时采取的正确立场是制造“如此规模的纠纷”。

第九件：日本人民反美爱国斗争。一九六〇年六月，日本人民掀起了空前的反美爱国正义斗争。铁托集团却为美帝国主义辩护说，美国对日本的占领，“曾促进了日本政治生活民主化”。以后，铁托集团又攻击日本社会党前主席浅沼稻次郎所说“美帝国主义是日中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的话，是“主张极端路线”。

第十件：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斗争。铁托集团破坏印度尼西亚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他们进行卑鄙的活动，企图阻挠印度尼西亚成立“纳沙贡”内阁，即包括民族主义者、宗教界、共产党人的民族团结政府。

第十一件：刚果事件。一九六〇年夏，当美帝国主义打着联合国的旗号，对刚果进行武装侵略的时候，铁托集团不仅在联合国投票支持美帝国主义，而且遵照美帝国主义的意旨，派遣了一批空军人员，直接参加对刚果人民的血腥镇压。

第十二件：老挝问题。一九六一年一月，当美帝国主义扩大对老挝的干涉的时候，铁托集团却宣传美国“真正关心老挝的和平和中立化”。一九六三年五月，当美帝国主义在老挝制造政治谋杀和武装冲突的时候，铁托集团又攻击老挝爱国力量“把一切都归罪于美国”。

第十三件：美国“争取进步联盟”计划。一九六一年八月，美国胁迫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同它订立所谓“争取进步联盟”计划，作为美帝国主义奴役拉丁美洲人民的新工具。这个侵略计划受到拉丁美洲人民的强烈反对，但是铁托集团却捧场说，它“在很大程度上符合拉丁美洲国家的要求”。

第十四件：中印边境冲突。自从印度反动派在一九五九年制造中印边境紧张局势以来，铁托集团一贯支持印度反动派对中国扩张、侵略和挑衅活动。他们公开造谣说“划界工作在本世纪初就以众所周知的麦克马洪线形式完成了”，并且极力颠倒黑白，诬蔑中国“放肆地用武力修改对印度的边界”，“侵略”印度。

第十五件：古巴革命和加勒比海危机。铁托集团发表了大量评论，攻击古巴“只是相信革命”，说什么古巴革命“与其说是典范，倒不如说是革命道路的例外”。在一九六二年秋天加勒



比海危机期间，铁托集团为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动辩护，说什么“困难是从古巴革命刺着了美国公司的痛处开始的”，说“美国可能为在古巴，在它的近邻设立火箭基地而被激怒，这是可以理解的”。

从这里人们不难看到，十几年来，铁托集团是怎样疯狂地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破坏民族解放运动，诋毁各国人民的反帝革命斗争，积极地为帝国主义效劳，特别是为美帝国主义效劳。

赫鲁晓夫口口声声说，苏共领导同铁托集团在国际问题上的立场是“吻合”的，“一致”的。好，我们要问：铁托集团所干的一系列反革命的罪恶勾当，同你们的行径究竟吻合不吻合，一致不一致呢？如果你们有勇气，就请回答吧。

从无产阶级专政蜕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南斯拉夫城乡资本主义的泛滥，南斯拉夫全民所有制经济蜕化为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南斯拉夫沦为美帝国主义的附庸，归根结底，是由于南斯拉夫党和政权性质的蜕变。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南斯拉夫共产党和南斯拉夫人民，对德国意大利法西斯侵略者进行了英勇的斗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在南斯拉夫的反动统治，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民主政权。

不久以后，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导集团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使南斯拉夫的党和国家政权逐步地蜕化变质。

南斯拉夫共产党，是有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的。铁托集团的叛变，首先在党内遇到了强烈的反抗。为了镇压这种反抗，铁托集团就利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权力，在党内排斥和清洗大批的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员。仅一九四八年到一九五二年，就开除了二十多万党员，占南共原有党员总数的一半。他们用“情报局分子”的罪名，大批逮捕和屠杀南斯拉夫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革命干部和革命人民，被逮捕和监禁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积极分子就数达三万人以上。同时，铁托集团对反革命分子、资产阶级分子、各色各样的反社会主义分子以及想凭党证升官发财的投机分子大开方便之门。一九五二年十一月，铁托集团宣称，“党这个名称不再适用了”。他们把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名称改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铁托集团违背南斯拉夫一切正直的共产党人的意志，改变了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使得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实际上成为维护铁托集团独裁统治的工具。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政权是由共产主义的政党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政党蜕化为资产阶级的政党，政权的性质也就必然由无产阶级专政蜕化为资产阶级专政。

南斯拉夫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是南斯拉夫人民长期英勇斗争的结果。但是，铁托集团叛变以后，这个政权的性质就变了。

铁托集团宣称，“无产阶级革命专政即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手段，越来越没有必要”。



但是，他們那里是不是沒有专政了呢？不。无产階級专政真的沒有了，資产階級专政不但有，而且是最野蛮的法西斯专政。

铁托政权設立了許多法西斯式的監獄和集中营，使用各种惨无人道的刑罰，折磨死了成千上万的革命者。同时，铁托政权大量赦免反革命分子和反法西斯战争期間的卖国賊。一九五一年一月七日，铁托在答合众社記者时說，南斯拉夫赦免了一万一千名政治犯。一九六二年三月十三日，又赦免了国外流亡的反革命分子达十五万人。对这些人民敌人的专政确实是取消了，这些人倒是得到了“民主”。铁托集团不管說得多么好听，他們所謂的“民主”，只是少数新老資产階級分子内部的民主，对于广大的劳动人民，却是彻头彻尾的独裁。铁托集团把在南斯拉夫一度建立的、用来鎮压剝削階級少数人的革命的国家机器，变为鎮压无产階級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国家机器。

南斯拉夫国家政权的蜕化变质，不是通过暴力推翻原有的政权，重建新的政权，而是通过“和平演变”的途徑。表面上看，掌握政权的还是铁托集团这一帮人，但是，实质上，这些人已經不再代表工人、农民和一切劳动者的利益，而是代表帝国主义和南斯拉夫新旧資产階級的利益。

铁托集团利用国家政权，掌握国家經濟命脉，最大限度地剝削南斯拉夫劳动人民，在南斯拉夫形成一个官僚資产階級。这个官僚資产階級，依附于美帝国主义，具有濃厚的买办性，也是一个买办資产階級。铁托集团掌握的政权，就是这个官僚买办資产階級专政的政权。

我們在上面所說的一系列的事实，从各个方面說明了铁托政权所执行的政策，是恢复和发展資本主义的政策，也就是使南斯拉夫重新回到半殖民地或者附屬国的政策。

南斯拉夫政权性质的蜕变，导致了社会主义經濟制度的破坏，資本主义經濟制度的复辟。当資本主义經濟制度以新的形式重新建立起来，新型的官僚买办資产階級逐步形成以后，他們就要求进一步强化資产階級专政，进一步发展同資本主义經濟制度相适应的政治制度，以巩固自己的統治地位。

在南斯拉夫，从党和政权的蜕变，到整个社会經濟制度的資本主义复辟，正是这样一步一步地实现的。南斯拉夫的蜕变过程，已有十五年之久。这是一部社会主义国家怎样“和平演变”到資本主义国家的历史。

铁托集团是依靠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依靠官僚买办資产階級专政的国家机器，依靠被收买的一批工人貴族，依靠农村中的富农，来維持他們在南斯拉夫的統治的。同时，他們还采取种种欺騙手段，来掩盖他們的反动面目，蒙蔽人民群众。但是，他們的反动政策，是极其不得人心的。从社会主义国家蜕化为資本主义国家，从独立国沦为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或者附屬国，这是違背南斯拉夫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是南斯拉夫一切正直的共产党人和絕大多数的人民群众不能不反对的。

我們对于南斯拉夫人民和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的处境，抱着深切同情。尽管铁托集团在一



个时期之内能够作威作福，但是，我们相信，任何一个与人民为敌的统治集团，不管采取什么样的高压手段，不管采取什么样的欺骗伎俩，总不会有好下场的。铁托集团当然也不会例外。被蒙蔽的人们终究会逐步觉悟起来的。具有光荣历史的南斯拉夫人民和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绝不会永远听从铁托叛徒集团的摆布。南斯拉夫人民的前途是光明的。

中共对南斯拉夫问题的原则立场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说，有一个时期，“中共领导人对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没有产生任何疑问”，又说，现在中国领导人“急剧地改变了自己在南斯拉夫问题上的立场”。

不错，南斯拉夫曾经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国家确实一度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发展。

可是不久之后，由于铁托集团的叛变，南斯拉夫的社会制度就一步一步地蜕化变质了。

一九五四年，当赫鲁晓夫倡议同南斯拉夫改善关系的时候，我们同意，为了争取南斯拉夫回到社会主义道路上来，并且对铁托集团作进一步的观察，把南斯拉夫当作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看待。

即使在那个时候，我们对铁托集团并不抱过高的希望。中共中央在一九五四年六月十日给苏共中央的信件中指出：应当估计到，南斯拉夫领导者在同帝国主义的关系上已经走得相当远了，他们可能拒绝争取，拒绝回到社会主义道路上来，“即使出现了这种情况，对于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阵营来说，在政治上也不会有什么损失，相反地却会在南斯拉夫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中进一步地暴露出南斯拉夫领导者的伪善面目”。

我们不幸而言中了！铁托集团果然完全拒绝了我们的争取，沿着修正主义的道路越走越远了。

铁托集团拒绝在一九五七年宣言上签字之后，在一九五八年提出了一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树起了一面现代修正主义的大旗，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公认的共同纲领一九五七年宣言相对抗。在国内，南斯拉夫已经一步一步地完成了资本主义复辟的过程。在国际上，铁托集团越来越卖劲地充当美帝国主义反革命的别动队。

在这种情况下，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对待铁托集团，已经不是对待兄弟党、兄弟国家的问题，已经不是争取他们的问题，而是坚决地彻底地对这个叛徒集团进行揭露和斗争的问题。这一点，在一九六〇年声明中，已经作了明确的论断。

苏共中央公开信故意迴避了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兄弟党会议以后的一系列重要事实，迴避了一九六〇年兄弟党会议作出的一致结论，却引用一九五七年九月十二日《人民日报》社论中关于南斯拉夫的一句话，为苏共领导的错误立场辩解，这完全是枉费心机。

事实证明，我们对铁托集团的立场，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是有原则性的，是符合一九六〇年兄弟党会议的共同协议的。而苏共领导千方百计为铁托集团翻案，恰恰证明他们背叛了



馬克思列宁主义，拋棄了一九六〇年声明，帮助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欺騙南斯拉夫和全世界人民。

是铁托“勾銷了錯誤”，还是赫魯曉夫以铁托为师呢？

赫魯曉夫說，南斯拉夫领导人勾銷了非常多的錯誤。可是，铁托集团并不承認錯誤，更說不上什么勾銷錯誤。铁托集团說，要他們改正錯誤，“沒有必要”，“只是浪費時間”，“这純粹是多余而可笑的事情”。

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铁托集团是不是改变了修正主义的綱領了呢？沒有。他們是不是接受了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了呢？沒有。他們是不是改变了国内的和国际的修正主义政策了呢？也沒有。

一九六三年四月，南斯拉夫联邦国民議會所通过的新宪法，最清楚不过地表明，铁托集团絲毫沒有改变他們的修正主义的立場。这个宪法，是把铁托集团的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綱領，用法律的形式进一步加以肯定。卡德尔在关于新宪法草案的报告中說，新宪法是南共联盟綱領的概念“在政治法律和組織方面的具体化”。

赫魯曉夫同铁托集团亲如兄弟，打得火热，并不是因为铁托集团改正了什么錯誤，而是因为赫魯曉夫跟着铁托的脚印走。

請看：

一、铁托反对斯大林，是从根本上反对馬克思列宁主义。赫魯曉夫全盘否定斯大林，也是从根本上反对馬克思列宁主义。

二、铁托和赫魯曉夫都否定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都攻击中国共产党人和其他坚持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人是“教条主义者”，都把自己对于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篡改說成是对于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創造性发展”。

三、铁托和赫魯曉夫都为美帝国主义的头子吹嘘捧場。铁托說，艾森豪威尔是“努力保卫和平的人物”，肯尼迪的努力“有助于改善国际关系和和平解决世界的迫切問題”。赫魯曉夫也說，艾森豪威尔“真誠希望和平”，肯尼迪“表現出对維護和平的关怀”。

四、铁托和赫魯曉夫都极力渲染核战争的恐怖，用来恐吓世界人民，要他們放棄革命斗争。铁托說，一旦发生核战争，那就是“人类的毁灭”。赫魯曉夫也說，一旦发生核战争，“我們將毁灭自己的諾亚方舟——地球”。

五、铁托同赫魯曉夫都宣揚，在还存在着帝国主义的条件下，就可以实现所謂沒有武器、沒有軍隊、沒有战争的世界。



六、铁托宣揚“积极和平共处”是南斯拉夫对外政策的“基石”。赫魯曉夫宣称“和平共处”是苏联“对外政策的总路綫”。

七、铁托和赫魯曉夫都宣揚“从資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增长了。铁托集团說，“人类正在通过各种途徑不可阻擋地深深地进入社会主义时代”。赫魯曉夫說，可以用“議会的道路”代替十月革命的道路。

八、铁托宣揚通过“和平竞赛”实现世界“政治一体化和經濟一体化”。赫魯曉夫也宣揚通过“和平經濟竞赛”，实现同帝国主义的“全面合作”。

九、铁托集团从各方面破坏民族解放运动和民族解放战争。赫魯曉夫借口“任何一个小小的‘局部战争’都会成为引起世界大战的火災的星星之火”，反对民族解放运动和民族解放战争。

十、铁托集团取消无产阶级专政。赫魯曉夫也在“全民国家”的口号下取消无产阶级专政。

十一、铁托集团否认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赫魯曉夫說，苏共已經“成了全体人民的党”。

十二、铁托标榜“非集团”，反对社会主义陣营。赫魯曉夫也說，“集团之类的說法是暫时的”。他們都要取消社会主义陣营。

如此等等。

从这些事实中，人們只能得出这样一个結論：赫魯曉夫無論在对外政策或对內政策上，实际上都是以铁托为师，亦步亦趋地沿着修正主义的道路滑下去了。

赫魯曉夫背棄馬克思列宁主义，撕毀一九六〇年声明，同铁托叛徒集团同流合污，这是完全違背苏联的利益的，是完全違背苏联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利益的。具有光荣的革命傳統的偉大的苏联人民，絕大多数的苏共党员和各级干部，絕对不会容許这样做。

偉大的苏联人民和苏共党员，絕对不会同意赫魯曉夫伙同铁托集团，反对坚持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

偉大的苏联人民和苏共党员，絕对不会同意赫魯曉夫伙同铁托集团，联合帝国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中国、阿尔巴尼亚等兄弟国家，破坏社会主义陣营。

偉大的苏联人民和苏共党员，絕对不会同意赫魯曉夫伙同铁托集团，联合各国反动派，反对各国人民，反对革命。

偉大的苏联人民和苏共党员，絕对不会同意赫魯曉夫学习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榜样，改变党和国家的性质，为資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

赫魯曉夫在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上空卷起了一片烏云。但是，在苏联共产



党的历史上，在苏联的历史上，这只能是一个插曲。一时受欺騙和蒙蔽的人們終究会逐步觉悟起来的。历史已經证明，并将繼續证明，任何人，要扭轉苏联人民前进的方向，都只不过是螳臂当車。他們永远不会达到自己的目的。

簡短的結語

資本主义在南斯拉夫的复辟，給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新的历史教訓。

它告訴我們，工人階級掌握政权以后，还存在着資產階級和无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争，还存在着資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条道路誰战胜誰的斗争，还有資本主义复辟的危險。南斯拉夫就提供了一个資本主义复辟的典型。

它告訴我們，工人階級的政党，不仅在沒有掌握政权的时候，有可能被工人貴族所把持，蜕化成为資產階級的政党，充当帝国主义的奴僕；而且在掌握政权以后，仍然有可能被新的資產階級分子所把持，蜕化成为資產階級的政党，充当帝国主义的奴僕。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就提供了这样一个蜕化变质的典型。

它告訴我們，社会主义国家的資本主义复辟，并不一定要通过反革命政变，也不一定要通过帝国主义的武装入侵，它还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国家领导集团的蜕化变质来实现。堡垒是最易从内部夺取的。南斯拉夫就提供了这样的典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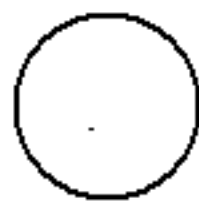
它告訴我們，修正主义是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老修正主义，曾經是帝国主义收买和扶持工人貴族的政策的产物。现代修正主义也是这样产生的。現在，帝国主义这种收买的規模，扩大到不惜工本地收买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集团，通过他們实现帝国主义追求的“和平演变”政策。美帝国主义把南斯拉夫看做“带头羊”，就是因为南斯拉夫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典型。

資本主义在南斯拉夫的复辟，可以擦亮全世界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眼睛，使人們更加清楚地認識到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看来，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就不能說，社会主义国家已經消除了資本主义复辟的危險。

苏共領導大吹大擂地說，他們那里已經消除資本主义复辟的危險了，已經建設共产主义了。如果真的是这样，这当然是令人高兴的。但是，我們看到的却是他們正在从各方面学习南斯拉夫的模样，他們已經走上了一条极端危險的道路。这使我們十分担忧，也使我們十分痛心。

我們本着热爱偉大的苏联和偉大的苏联共产党的心情，仍然願意向苏共領導誠懇地呼吁：同志們，朋友們，南斯拉夫的道路是万万走不得的！赶紧回头吧！不然，就太晚了。



收获时节訪小平易公社

吳 象 張长珍 姚文錦

九月上旬，不必在江南，就在晋南盆地，也还是骄阳似火，炎热炙人的时节。而在高寒的雁北，却凉风阵阵，严霜将降，秋收已经开始了。

雁北是雁门关外各县的总称，由于地处内外长城之间，又称塞上。这里是历史上著名的古战场，也是旧中国著名的荒凉、贫瘠之地。“枯草黄沙满目哀”，这一句诗，写尽了过去塞上的景色。频繁的自然灾害，加上贪婪的反动统治者的压榨，使雁北的农民挣扎在饥寒交迫之中。

解放以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被推倒了，雁北的人民和全国人民一起站起来了。长期停滞的生产逐渐发展了，人民生活也不断地得到了改善。但是，自然灾害这个凶恶的敌人仍然在威胁着雁北人民的生产和生活。从一九六〇年起，连续三年大旱。俗语说，“大旱不过三年”。第四年，该是好年景了吧。谁知今年只在立夏前后下了一场稍大的雨，就又旱起来了。毗邻的各地，雨水都比较充足，唯独雁北，不见下雨。连续三年遭灾之后，又遇上这种“卡脖子”大旱，秋收将是个什么景象呢？

最近，我们怀着不安的心情，访问了塞

上朔县的一个人民公社。

这个公社的名字，叫“小平易”。

小平易公社，在朔县城北二十里洪涛山的脚下。全公社共有一万二千多人，六万一千多亩地。二十个自然村，分为十八个生产大队，九十二个生产队。五个大队在平川，十三个大队在山地，但是从人口和土地上来看，平川和山地恰好各占一半。这个公社和雁门关外一般的公社一样，经常受干旱的威胁。北面有几个山口，狂风经常卷着飞沙袭来，这里首当其冲。可是，每逢大雨，山洪暴发，长起的庄稼也会被水冲走。去年这个公社就是遭了旱灾以后，又遭到特大的洪灾的。旧的创伤还没有完全平复，今年的大旱又带来了新的严酷的考验。小平易公社的灾情大概要比别处更重些吧。

但是，刚从县城出发不久，我们发现沿路的庄稼长得不错，就开始怀疑原来的担心是否多余。越往小平易走，令人鼓舞的丰收景象越是明显，我们的不安，也就越来越被惊喜和兴奋所代替了。看，成熟了的高粱，秆粗穗大，火红一片，黍、糜大部已经割倒，金黄的谷穗沉甸甸地低垂着头，茁壮的玉米长势喜人。耿庄有一块两千亩的大片玉米田，



每亩约一千六百株，百分之三十是双穗。顺手掰开一穗来看，颗粒饱满，闪闪发光。山坡上、田野里，到处是欢乐的人群，紧张地挥舞着镰刀。村边打谷场里，庄稼堆得像一个个小山头。三头大骡马拉的胶皮大车，满载着新割下的庄稼又过来了。赶大车的年轻人手里甩着响鞭，嘴里哼着歌儿，更增添了丰收的喜悦气氛。在山区，新修的水平梯田和防风林触目皆是，上泉观、魏家窰的水平梯田已占到耕地一半以上。在平川，安庄一带渠道两旁的杨树已密密成林，纵横相接，逶迤数十里。社员们生龙活虎地收割了一阵，就到渠边树荫底下喝水、抽烟、歇息。我们也坐下来，问他们年成怎么样。一个性急的青年抢着回答：“反正咱安庄八个生产队，队队都要超包产，到底谁超得多，还要再赛一赛。”说得人们都笑了。一个老汉把烟袋在鞋底上磕了磕，却幽默地反问我们：“你们看怎么样？你们见过在灾年收成这样好的没有？”紧接着，他又说：“真是天旱地不旱，灾年大丰收，我活了五十多，还是头一遭见哩！”

看到的这些景象，遇到的这些人，完全证明我们原来的担心确实是多余的了。这些，后来在公社党委书记的谈话中，更得到了证实。

公社党委书记岳来秀同志告诉我们：“高级合作社时期的一九五七年，这里粮食总产量是六百零五万斤，虽然亩产还不到百斤，但已经不是单干时期所能比拟的了。人民公社化以后，粮食的产量又提高了。一九六〇年遭了旱灾，当时公社成立不久，抗灾的能

力还不大，粮食产量也达到六百二十八万多斤，比公社化前还是提高了。一九六一年又遭旱灾，产量却上升为七百一十八万多斤。一九六二年是第三个旱灾年，庄稼却比上一年长得更好。不料收割之前又发生了一次特大的洪灾和两次严重的雹灾，产量下降为六百零二万多斤。今年全社计划产量是七百四十万斤。从现在已经收打的实际情况来看，可以普遍超产。如果收打工作做得更细致一些，超产一成很有希望。这就是说，总产量可能达到八百万斤左右，和大丰收的一九五八年不相上下。所以说，灾年大丰收，不是没有一点根据。”

他笑了笑，又接着说：“丰收不丰收，不能仅仅从产量上去看。我们的产量还不算高，连我们自己都不满足，增产的潜力还很大，但重要的是战胜了灾害。如果在解放前，遇上这样的灾年，真不知道又有多少人卖儿卖女，讨吃要饭。那时，这二十个村，除了平川一两个村以外，几乎村村缺粮。就是在平川的耿庄，三百多户中，还有一百八十六户当长工，二十三户讨饭，不少户卖儿、卖女、卖老婆。山区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户，多是白天穿什么，晚上盖什么，没有被褥。直到公社化以前，还有上泉观、魏家窰等九个大队要靠国家供应粮食。现在呢？全公社社员家家户户有穿有盖，许多社员还买了新毯子，穿上了大皮袄。过去这里很少见过的自行车、收音机、马蹄表、座钟等等物品，现在许多社员家里都用上了。今年，尽管连续四年遭灾，却不但不要国家供应一颗粮食，而且有



十六个大队要卖给国家二百五十九万斤粮食。此外，还要储备六十万斤。”

岳来秀同志说起话来缓缓的，显得很平静，好像他说的都是些平常事，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是，往昔的灾难，当前的欢乐，对比如此鲜明，变化如此巨大，我们听了却禁不住心潮滚滚，平静不了。

“为什么灾年能够大丰收呢？”

岳来秀同志思索了一阵，才又缓缓地說：“乍想好像不成问题，党和毛主席的领导嘛！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威力嘛！但是，为什么公社有这么大的优越性呢？怎样去发挥它的优越性呢？的确应该好好想一想，有些事情恐怕还得谈到五年以前。”

于是，他和我們一起，回溯了五年来人民公社同自然灾害的斗争。

要战胜灾害，改变塞上低产的面貌，最重要也是最根本的问题是抓水。

有水嗎？有。雁北地下水不少，地上水也不少。可是，在旧社会活命都不容易，谁还顾得上什么水不水呢？赵家口山里有一股零点二六个流量的河水，长年白白地流走了。但是，发山洪的时候，水一来又是一场灾。一九一九年有个大地主叫李树株，在下游修了一道十二里长的渠，才算有了点水地。李树株专门给水渠起了个怪好听的名字，叫什么“民丰渠”，实际上不过是条“吸血管”。沿渠各村，谁要用水，每亩得给他交米三斗，或者浇水一亩分给他半亩地。这个精于剥削的地主，就靠这条“吸血管”发了大财，刮走了农民四百亩好地。直到土地改革，这些土地

才回到农民手里。可是这里水地面积发展得比较慢，到一九五七年还只有四千亩。合作化使农民看到了组织起来的力量，激发了战胜灾害的斗志，抓水的劲头起来了。沿渠好几个合作社，都向乡里、区里要求延长渠道，扩大水地。水源不足怎么办？修建水库，拦蓄洪水。这种大工程谁家办得了？办不了就联合起来办。他们果真联合起来了，赵家口水库动工了。水库动工不久，成立了人民公社。公社化大大促进了水利建设的发展，水库上前一段许多不好解决的问题都解决了，工程的进度大大加快了。

“让洪水听咱们的話！”“让旱魔向咱们低头！”这是人民公社发出的战斗号召，是历史上没有过的豪言壮语。广大群众的热情沸腾起来，成千上万的人踊跃报名，雄赳赳气昂昂地奔赴水库工地。山沟里歌声嘹亮，红旗飘扬。苦难的人们受尽了灾害的折磨，如今组织起来、团结起来同灾害进行斗争了。在那些紧张战斗的日日夜夜，出现了多少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啊！依靠人民公社大集体的威力，依靠国家的支援和友邻公社的支援，赵家口水库基本上建成了。

但是，战斗并没有完结，而只是开始。

水库西南，有一道高土梁，叫“火石梁”。火石梁两旁横贯着大大小小四道沟。土梁和沟壑挡住了水的去路，不劈开火石梁，填起四道沟，有了水源，水地面积也不能扩大。修库的工程艰巨，开渠的工程更艰巨。修库成功了，开渠却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为修成一条输水的渠道，前后战斗了五年，失败



了五次。就这样认输了吗？不。英雄的人民不会在困难面前低头。越困难越顽强，越失败越坚韧。一定要让洪水听咱们的话！一定要让旱魔向咱们低头！为了要赶到洪水前面，第六次战斗提前在去年冬天就开始了。社员们豪迈的英雄气概，冒着塞上刺骨的尖寒，在冰天雪地里搏斗。五年的实践，使人们更加深信人民公社大集体的威力。多次的挫折又使人们锻炼得更加沉着，更加坚毅。到今年四月，火石梁大渠，终于修通放水，在抗旱斗争中发挥威力了。公社又从各个大队抽调了十一个土专家，组成水利专业队，指导水库和大渠的维护和加固工程。目前，全公社已有八千亩全年无雨保收田，四万六千六百亩一春无雨保种田。明年水地面积还可以继续扩大。

丰收，不会是大自然的恩赐。灾年的丰收，更需要付出双倍的劳动。去年秋天以来，整整旱了一年，也整整抗了一年，越旱得厉害，就越抗得起劲。最后谁战胜谁？人民公社战胜了自然灾害！而人民公社之所以胜利，不仅由于它能够充分发挥大集体的力量，而且由于这个力量在五年中逐渐巩固，不断发展，日益加强。实践证明，人民公社制度在这多灾多难的土地上已经深深地扎下了根。翻了身的中国人民，要靠它再翻一次身，推倒贫穷和落后的大山，彻底改变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穷二白”的面貌。

人民公社在组织农民抗灾增产的过程中，还在一步步地引导农民向农业现代化迈进。

在人民公社成立的短短的五年中，小平易这个过去被称为“雁门关外野人家”的地方，不但出现了机器耕地、施用化肥的新事，而且从去年开始，又响起了向电气化进军的号角。占公社人口三分之一的耿庄、安庄、小平易、木寨、张家口等五个大队，已经安上了电灯，有的还用电力代替人工和牲畜磨面。今年七月，正在庄稼吐穗的时候，木寨大队出现了两眼电井。当银练般的地下水在噤噤的马达声中涌出地面的时候，扔下饭碗的男人看来，抱着娃娃的女人看来，孙子扶着爷爷看来，媳妇领上婆婆看来，井边赛如赶会，人挤着人。有一个叫池来喜的老汉，一连十来天在井边转，舍不得回去。“老天不下雨，地上能冒水”，老汉说，自己多亏活了八十岁，赶上这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的好世道。

有了水，有了机器，有了电，可是人们并不满足。像重视抓水一样，公社还很重视因地制宜地推广农业八字宪法中的其他增产措施，在耕作制度、耕作技术、作物改组、选用良种、增施肥料等等方面进行改革。任何改革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而人民公社在短短的五年之内，靠着它比合作社强大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已经改变了不少这里长期存在的根深蒂固的传统习惯。

例如，玉米播种面积的扩大，是今年丰收的重要因素之一。而它却经过了扩大——缩小——再扩大的过程。本来玉米是一种普通的作物，产量高，又怕风、怕雹、怕霜，很适宜于雁北种植。可是，由于这里历



史上沒有種植玉米的習慣，單干時期根本推廣不開，合作化時期也只有個別的合作社種植得比較多。公社化以後，才大面積推廣開來。當時因為初種，沒有掌握種植技術，產量並不高。因此，有許多社員不願意種。於是，第二年面積又大大縮小了。以後經過種試驗田，總結豐產經驗，面積才又逐年擴大，由五千畝增到七千畝、九千畝，畝產也由二百三十斤增到二百七十斤、三百斤。現在廣大社員都喜欢玉米，把玉米當作一件寶。為了保持作物之間適當的比例，反而要勸他們不要種得太多了。

廣種薄收，是雁北農業生產的特點，因此耕作非常粗放。這種舊習慣當然也不好改，然而近年來已經有了很大變化。特別是今年，完全當得起“精耕細作”四個字。往年秋耕不足三分之二，去年秋耕達到百分之百，平川有一萬三千畝地用拖拉機深耕過。一入冬，在“提前消滅春旱”的口號下，又大力開展了耙、耨、壓、礮的保墒活動，有些大隊還進行了復耙復耨，春耕春種很講究質量，大秋作物夏鋤普遍達到三次以上。因此苗全、苗旺、沒草，抗住了乾旱，爭得了豐收。不久以前，公社又利用農事間隙，組織了一次深翻地活動，有近三千名精壯勞動力參加。公社、生產大隊和生產隊的幹部幾乎全部參加了。規模之大，干劲之足，質量之高，都是從來沒有過的。公社把這作為改良土壤，實現技術改革的重要項目之一。人挖與機耕、畜耕並重。全公社計劃深翻土地四萬畝，為爭取明年更大的豐收創造條件。

進行農業技術改革，實現農業現代化，在這裡雖然僅僅是個開端。但是小平易公社的農民，正是從這個開端中看到了無限美好的未來。

人民公社在改變低產面貌的同時，也改變了和改變着人們的精神面貌。五年來大大小小的一次又一次的抗災鬥爭，每一次都在農民的心靈深處打下一個依靠公社，依靠集體，同舟共濟，人定勝天，共同富裕的思想烙印。

去年七月，一場久旱之後的暴雨，耿莊遭到了嚴重的水災。遭災後的第二天一清早，來自十個大隊的七百多人趕到了耿莊。有幫助放水的，有幫助撈東西的，有搶修堤壩的。木寨大隊的三輛馬車出動拉糧，安莊大隊的五輛馬車出動拉炭，公社供銷社的六個售貨員帶着衣服和日用品來了，公社醫院的四名醫生帶着很多藥品來了。人們從四面八方湧向耿莊。在這些支援的人群中，來自木寨大隊的人，尤其使耿莊的社員心情激動。在舊社會這兩個處於上下游的村莊，在地主階級的挑唆下，曾發生過數百人的械鬥，結下了“世仇”。直到合作化時期，為爭水還不時鬧点小磨擦。只是在公社化以後，才成了一個大家庭中的兄弟，逐漸互相親密起來。本來木寨也遭災了，但是木寨的社員却說：咱們災輕，先顧耿莊當緊。耿莊的大渠決了三個口子，滾滾奔騰的洪水有使一千畝良田變成溝壑的危險。木寨的社員紛紛放下手裡的營生，趕到耿莊的地界，冒險堵渠排水。

人民公社是由高級社聯合起來的大集



体，比一个一个的高级社具有的更大的优越性，通过这些事例，明显地表现出来。这个集体主义思想的大课堂、活教材，教育了耿庄的人，也教育了全公社的人。耿庄有个名叫王巨的社员，当洪水把他的房子冲毁以后，不吃饭，不喝水，颠三倒四地重复着一句话：“我该怎么办呀？我该怎么办呀？”在旧社会，当王巨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遭过一场洪灾。那场洪灾虽然只冲走了些粮食、衣服，房子还是好端端的，他父亲就一蹶腿走了口外，扔下他妈和他，讨了半年吃。悲惨的回忆，使他的思想混乱了。但是时代不同了，今天是人民公社的时代，兄弟队的热情的支援，人民公社集体的伟大力量，使他清醒了过来，坚定了起来。王巨和所有社员一样，握紧了拳头，扛着铁锹、锄头，又下地干活去了。灾害没有压倒他们，他们却以更团结更坚韧的斗争压倒了灾害。去年七月洪水冲倒的房子，到今年八月就又新盖起八十间。王巨也住到新房子里了。

今年又是大旱，但是耿庄的产量却比特大丰收的一九五八年至少增加百分之四十以上。这是一种难以估计的巨大的精神力量！

公社化以后，由于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的组织，领导更加深入具体了。由于各村联合成“一大家子”了，农民眼里看的、心里想的，不只是本村的小圈子，而是整个的公社了。这样就给先进经验的交流，互相帮助和支援，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

这个公社有三个增产幅度大的生产大队，耿庄、安庄、上泉观。三家各有独特的经验：耿庄是引洪灌溉、作物改组，安庄是精耕细作、园田化，上泉观是水土保持、造

林防风。从一九六一年开始，公社树立起这三面旗帜，不断总结他们的经验，组织参观、座谈、推广，使各个大队增产的单项经验，逐步发展为全公社的成套经验。今年春天，推广先进经验又有新的发展。两个最先进的大队主动提出包干帮助两个最落后的大队。这样，帮得更具体，学得也更起劲了。

连年大旱，水贵如油。在推广耿庄、安庄节约用水的经验以后，全公社各个大队的九千多亩高产作物玉米，根据当地的具体条件，今年把七千亩基本上连成了一片。水来了，一块挨住一块浇，再不像过去那样，你种麦子，我种黍子，你要浇，我不浇，把水浪费在渠道里。春灌时，种植高产作物少的大平易、斗沟等大队，一算计，自己浇十亩，也不如兄弟大队浇上二亩增产多，便把水让给了耿庄、安庄。夏浇莜麦时，耿庄的莜麦地没有木寨多，舍不得把水用于其他作物，便把水让给木寨多浇一天。浇玉米时，木寨的玉米地没有耿庄多，就又把水让给耿庄多浇了一天。元子河大队轮不上浇水了，可是有二百亩一亩能收几亩粮的玉米没有浇过，各大队便公议匀给元子河浇上一天。各个大队联合起来，互相支援协作，共同对付自然灾害的结果，是共同取得了抗灾增产的胜利。

人民公社的巨大的生命力，不仅表现在对自然灾害作斗争，同时还表现在它所实行的管理制度，更完满地体现了社会主义原则，有效地同剥削阶级思想影响和旧习惯势力的侵蚀作斗争。别的不说，只看看这里的干部和群众的关系就很清楚了。

公社党委书记岳来秀同志给我们讲了一



段发人深思的故事。一九六〇年遭了旱灾，有两个三百户以上的大队，自然条件并不见得差的祝家庄减产特别严重，自然条件并不见得好的耿庄却大大增产。这个强烈的对比引起了公社党委的注意。为什么差别这么大呢？下去调查研究。调查来调查去，原来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一个队的干部积极劳动，一个队的干部不怎么积极参加劳动。耿庄二十九名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经常和社员肩并肩、膀挨膀，扑倒身子一块干活。社员们说：“干部跟咱们同甘共苦，心连着心，就是累弯了腰，心里也痛快。”天越旱，他们抗旱的劲头越大，什么抗旱的措施，一条条都能兑现。而祝家庄呢？大队的干部不积极下地，生产队的干部中，有不少人也跟着样子学。干部一脱离劳动，耳也聩了，眼也花了，什么也听不到、看不见了，社员的干劲也受到影响。大旱当头，怎么能不减产？这样一调查，一研究，一对比，给公社党委上了一大课，知道要搞好生产，不仅要同自然灾害作斗争，还要同轻视体力劳动的思想倾向作斗争。这是“兴无灭资”的思想斗争，比同自然灾害作斗争更要艰巨、复杂，而且是对发展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带有决定性的环节。从一九六一年起，公社党委就紧紧抓住干部参加劳动这一环。果然灵，这像是把钥匙。干部一带头，社员群众在抗灾斗争中就越来越强。

小平易公社，现在干部参加劳动已成了风气，这和公社干部带头是分不开的。岳来秀同志兴奋地告诉我们，公社党委是怎样教育和组织干部参加劳动的。他谈得很多，直到夜深了还在谈，就是没有谈他自己的事

情。后来，从公社一些同志那里，从社员群众那里，我们了解到，正是他，从十四岁起就给地主打短工，学会种庄稼的本领。当了公社党委书记，始终不忘庄稼人的本色，走到哪里就劳动到哪里，和群众打成一片，因而受到群众的爱戴和信任。正是他，当去年水淹耿庄的时候，奋不顾身地抢救社员，自己却晕倒在洪水里。在他的示范影响下，公社一级的十三个干部个个力争成为生产上的能手，人人自备铁锹、锄头和镰刀，到哪个队工作就在哪个队和社员一起干活。在他和公社一级干部的示范影响下，全公社一百八十名受补贴的干部，今年头八个月就做了四万三千八百多个劳动日。干部在劳动中扛起了正梁，群众的劳动积极性就更高了。这样，公社的优越性也就能够更好地发挥出来，在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中显示了巨大的威力。

九月十六日，我们辞别了小平易公社。但是，小平易公社的丰收景象，使我们久久不能忘怀。小平易，小平易，其实，它既不小，也不“平易”。在这个原本十分贫瘠的地方，在风调雨顺的年月中获得丰收，已经会使人们感到惊讶，而在这连遭灾害的一九六三年，竟然获得大丰收，它的意义就更加深远了。像小平易这样重灾丰收的社，在雁北并不是一个，而是许多个。这些社与其说是增加了粮食，不如说是扭转了历史，使灾年减产的历史变为灾年增产的历史，使塞上低产多灾、生产升降不定的历史，开始变为战胜灾害、生产稳定上升的历史。而且历史的这种发展趋势，随着人民公社的成长，已经是任何力量永远无法阻挡的了。



关于发现问题和分析研究

严 中 平

科学研究的方法问题，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为指导，在总结专门学科的具体研究经验中，去寻求解决。本文是我

们几个中国近代经济史工作者对这个问题的粗浅体会，偏狭片面的地方，可能很多，写出来供大家参考。

一、对研究对象进行大略的调查研究，发现问题，抓住关键

科学研究工作的第一步，是选择研究题目。选好了研究题目，就是确定了某种特定的研究对象。人们在研究工作的开始阶段，对于自己所选的特定研究对象的认识，大致不外两种情况：或者是朦朦胧胧，只有一个轮廓，至于其中究竟包含什么问题，则不甚了了；或者是头绪纷繁，处处是问题，形不成系统，抓不到关键。这个时候，科学工作者首先要对研究对象进行大略的调查研究，发现问题，抓住关键。

为了发现问题、抓住关键而进行调查研究，包含两方面的工作：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原则方面的研究和特定研究对象的实际知识方面的了解。在研究工作的开始阶段，就要求对这两方面进行彻底的研究和了解，当然是不现实的。但是大略的调查研究，却是必要的。所谓大略的调查研究，在理论方面，需要做到基本上能够正确地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关的理论原则；在实际知识方面，需要掌握基本上能够暴露事物主要矛盾

所必要的那些资料。一般说来，人们对这两方面的工作做得越多，那么，问题提法的正确程度就越大。

大略的调查研究，可以从检阅前人的研究成果做起。通过前人研究成果去发现问题、寻找关键，不仅仅是一个方便的入手方法，而且是一个必须经历的工作步骤。忽略了这一点，就难免重复前人的劳动，或者重蹈前人的复辙。

检阅前人有关自己专题的研究成果，对我们来说，当然首先是指前人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专题论著而言的。其次，还应该放宽眼界，把中国古代的和外国古代的、近代的有关历史知识也包括在内。

毛泽东同志告诫我们，研究问题忌带片面性。片面地看问题，“是不能找出解决矛盾的方法的”^①。例如，既然在中国近代史上，帝国主义成为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一座

^①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301页。



大山,那么,我們研究中国近代經濟史,就不能不了解帝国主义方面的有关历史实际,不能不了解帝国主义侵略的根源及其特点。否则,就会形成主观片面性。

注意中国古代的和外国古代的、近代的有关历史实际,还可以从比較研究中得到启发和发现問題。

恩格斯指出过,为了全面地批判资产阶級政治經濟学,“光知道資本主义的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形式是不够的;还必须对在它之前存在过的或者在发展較差的国度內和它同时存在的那些形式,至少对其主要特征,加以研究,并予以比較。”^①可見,对于我們來說,不論是中國封建社会也好,外国的封建社会、資本主义社会也好;都應該列为比較研究的对象。这样說,当然不是要求人們漫无边际地放寬研究范围。至于怎样放寬眼界而又控制得当,只有在研究过程中經過摸索才能解决。

檢閱前人成果的具体方法,可以从分析前人的分歧点和問題的提法入手。

“眞理是由爭論确立的,历史的事实是由矛盾的陈述中清理出来的”^②。前人爭論中的分歧之点,常常就是問題的關鍵所在,也是前人成果中最能启发我們思考的部分。但是,必須看到,前人的分歧之点也可能偏离問題的關鍵,只是在表面的枝节問題上爭論不休。这就会把我們的思想引上錯誤的方向。因此,我們必須批判地檢查前人的爭論焦点,把問題提到更高的理論原則上去考察,另辟蹊徑,发现新的問題,找出新的關鍵。

批判地檢查前人的爭論焦点,首先需要考察前人提出問題的前提和基本观点。前

提和观点常常并不是明白交代出来的,这需从前人論著的精神实质中去寻找。在这方面,我們过去比較容易产生两种傾向。一种傾向,是拘泥于經濟史这門学科的对象范围,把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和階級力量对比的时代背景,完全排出視野之外,就經濟論經濟,使經濟脱离政治。另一种傾向,是忽略了科学工作必須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根本要求,厚古薄今,玩物丧志。从这样的前提和观点出发,自然很难正确地提出問題。

考察前人对問題的提法,还必须找出前人所引馬克思列宁主义經典著作的原文来进行核对。在引证經典著作时,我們比較容易发生的偏差是忽略經典作家的立論前提,或者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等等。这些偏差,一經核对,大致都会暴露出来。

考察前人对問題的提法,还應該注意前人据以立論的史事和史料是否充实可靠。

馬克思列宁主义經典作家一再告誡我們,應該进行系統的、周密的調查研究,詳細地占有材料。不論是查勘前人据以立論的史事、史料也好,或者是前人未曾討論而必須自己收集資料从中发现問題也好,都要注意史料是否全面系統及其可靠性、局限性的問題。

为了找到大量的系統而又可靠的資料,必須具备丰富的目录学知識。为此,除去充分利用工具书以外,就只有依靠博覽群书,

① 恩格斯:《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54頁。

② 1853年9月2日《馬克思致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1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567頁。



长期积累的硬工夫了。一个科学工作者需要养成一种习惯，随身携带小本本，经常做个“有心人”，经常有所寻求，逐步积累一套自用的目录索引。这没有什么窍门可说，关键全在一个“勤”字，即脑勤、眼勤、手勤。

鉴定材料的可靠性和局限性，是一件十分复杂而又细致的工作。做好这项工作一个总的原则是，用历史主义的观点去进行考察。这就是从各个方面去考察形成资料的历史条件，诸凡文献的取材来源、形成经过、读者对象、目的要求，资料提供人或编撰人的阶级成份、政治立场、思想面貌、生活经历、治学作风乃至当时的典章制度、传统习惯等等，都会对资料的可靠性和局限性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这里面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资料提供人或编撰人的阶级立场问题。

文献资料的可靠性、局限性常常不是那么显著突出，一目了然的，而是异常隐晦，需要多方核校、细心推敲才能明确的。例如，一九三二年，南京国民党政府曾经根据土地册籍估计过全国的耕地面积。后来他们对南昌周围十七个县进行航空测量的结果表明，册籍数字只占测量数字的百分之六十八。这

说明地主阶级为了逃避田赋负担，以多作少，把将近三分之一的土地都隐匿掉了。可见，不审校、不推敲，人们是很难得知史事的真相的。

大致可以这样说，文献所记事实，越是有损于资料提供人或编撰人本阶级、本集团或个人利益的，则其阶级偏见就越深，可靠程度就越小；文献的流通范围越是狭窄不易泄密的，则资料提供人或编撰人的态度，可能就越是比较坦率；资料提供人或编撰人的思想政治作风越是接近人民的，其治学态度越是谨严不苟的，或者当事人记录当时当地亲身经历的，则文献的可靠性就越高，否则，就越低。总之，人们必须用历史主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去考察资料的可靠性和局限性。

我们所说的大略的调查研究，当然不可能把有关材料全面地搜罗无遗，也不可能对史事史料件件都下考订工夫。但是，为了提高问题提法的准确性，对于那些直接关系到问题提法的材料，必须足够丰富和可靠，这是肯定的。因此，大略的调查研究也必须花费相当大的工夫。

二、追踪历史过程的依次发展阶段，揭示历史现象的阶级实质

假定人们已经收集到丰富的准确可靠的资料，应该怎样进行分析研究，才能正确地发现问题，抓住关键并且找出规律来呢？不言而喻，这就是怎样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来研究中国实际的问题。以下，只就历史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谈谈我们的一些体会。

唯物辩证法认为，一切事物都处在不断

地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在这一过程中，事物内部所包含的矛盾，有些是激化了，有些是缓和了，有些暂时地或局部地得到了解决，又有些是发生了。“因此，过程就显出阶段性来”^①。科学研究的要求，就在于“从这一过

^①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2页。



程的一切迷亂中追蹤其依次發展的階段，並且證明其在一切表面偶然性中的內在規律性。”^①（着重點是本文作者加的）因此，人們必須從歷史的發展過程中去進行研究，否則就看不出矛盾的激化、緩和、解決和產生，就抓不住關鍵問題，當然更說不上劃分歷史階段，發現內在規律了。

這裡所說的“依次發展的階段”，可以作兩種理解。一種理解，是某一事物的歷史過程上先後相承的依次發展階段；另一種理解，是同時並存的某些事物在性質上形成先後相承的依次發展階段。

就前一種意義上說，這裡的“依次發展的階段”，可以意味着整個人類歷史上，先後遞嬗的、以千百年計的各種獨立的社会經濟形態；可以意味着同一社會形態中，以數年或數十年計的階級鬥爭的發展階段；也可以意味着某種更為短促的發展過程。總之，都是由事物內部矛盾發展變化所形成的某種發展段落。人們為了正確地分析問題，必須從歷史過程的長河中，正確地截取足以成為獨立研究對象的某一時代或某些年份的現象來進行研究。

馬克思曾經指出，“在政治經濟學中，任何時候都絕不能僅僅根據一年的統計材料就得出一般規律。常常需要引證六、七年來的平均數字，也就是說，需要引證在現代工業經過各個階段（繁榮、生產過剩、停滯、危機）而完成它必然的周期這一段時期內的一些平均數字。”^②馬克思的意思是說，除非長達六、七年的統計材料就不夠暴露危機各階段的全部矛盾及其發展變化的規律性。上面的說法，是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恩格斯和馬克思考察一

八二五年後四次危機的間隔年限所得到的初步結論。到了七十年代恩格斯便根據新的歷史事實修改了這個估計，把六、七年的間隔延長為十年。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作家是根據一八二五——一八七三年這四十七年間八次危機的歷史，才得出這樣的結論的。

我們絲毫無意於說，人們研究任何經濟現象，都必須積累幾十年的材料才能找出規律來。但是，可以肯定說，在絕大多數的情況下，僅僅根據一年的材料，總是很難找出規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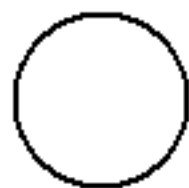
當人們對自己研究對象的內在矛盾和矛盾發展的階段性，還茫無所知的時候，必須採取某種具體辦法去追蹤矛盾的發展歷程，劃分階段，哪怕只是初步的未必怎樣完善的辦法也好。

我們認為，在這種情況下，初步的入手辦法是把歷史現象按照時間順序編排起來，描出一幅粗綫條的歷史輪廓來，然後再從現象深入本質，從事物的歷史聯繫中去尋找事物的邏輯聯繫。這可採取兩種辦法，即整理長期統計數字和編寫年表或編年紀要。

就近代經濟史研究來說，長期統計數字乃是科學研究上的基本材料。例如，經濟各部門生產資料的占有狀況，對內對外貿易狀況等等長期統計，就是把複雜的經濟現象，概括為簡單的数量概念的基本材料。對這些材料進行科學的加工，制成統計圖表，人們就能把經濟發展趨勢及其中的內在矛盾揭露

① 恩格斯：《社會主義由空想發展為科學》。《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33頁。

② 馬克思：《關於自由貿易的演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版，第450頁。



出来，大大地有助于发现问题和确定历史过程的阶段性。

历史现象中，有许多是难以用统计数字去表现的，这就需要编撰年表或编年纪要。

把历史事件写成编年纪要，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从事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工作方法。马克思就写过详细的世界历史事件“编年史”。

在具体工作中，有几个要点值得一提。首先，人们不能随意抓到任何历史事件都拿来编写年表，而必须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观点，去考虑历史事件对自己研究对象的关系，以决定取舍。其次，必须像马克思那样严格地查考史料的准确性和史事的真实经过。第三，应该牢记某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年代、简单经过及其主要影响。这是清理历史联系，进行“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推理工夫的思想支撑点，常常很有助于我们“追踪”历史过程中的依次发展阶段。第四，对于那些进步的新生事物要作比较详细的探索，追根究底，明确其产生经过。因为进步的新生事物产生，乃是落后的陈旧事物衰朽灭亡的信号，即使是零星、微弱的现象，也具有重要意义。第五，抓住历史的转折点或各种矛盾的焦点进行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在经济史上，重要财经制度或方针政策的制定和转变等等事件，常常形成这样的转折点；而武装斗争与经济危机的爆发和发展，则突出阶级矛盾的焦点。转折点和矛盾的焦点都是历史过程上的“节骨眼儿”的地方，能够集中地、突出地暴露各阶级的真实面貌。从这里，人们往往能够找出在通常状态下不易察觉的那些本质的东西。

现在让我们来谈谈“追踪”历史过程中依次发展阶段的另一种办法，这就是对时间上同时存在而在性质上形成依次发展阶段的那些现象进行研究的办法。

在任何时候，人们都会发现社会经济生活中同时存在着进步的新生事物和落后的陈旧事物，以及处在这两极之间不同发展阶段的各种过渡形态。例如，在旧中国，人们可以同时看到封建地租中的劳役地租、实物地租和货币地租三种形态；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人们可以同时看到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和大工业三种形态。研究这些现象首要的一步工作，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考察这些现象的“内部联系”，进行科学的分类归纳，正确地估计各种现象的历史的先进性和历史的落后性，以便据以突出历史过程的发展线索。

让我们向列宁学习。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前四章中，大量地引用了地方自治局的材料。这些材料大部分都记录少数年份的“横断面”的现象，而不是前后连续成长时期的“纵剖面”的现象。但是，列宁却巧妙地运用科学的分类方法，突出了历史过程的发展线索。列宁的提法是：农民的“分化”、上等农户土地的“集中”、下等农户土地的“出让”、国内市场的“形成”、工役制的“衰落”、资本主义的“产生”、……等等，一句话，列宁用历史的、发展的观点去对“农民分化的静态”^①（着重点是本文作者加的）进行了研究，令人信服地证明了俄国农业资本主义化的必然性。

必须指出，我们说运用历史唯物主义

①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51页。



的观点去进行考察，不言而喻地同时意味着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用阶级分析方法去进行考察。

对经济史工作者来说，在具体运用阶级分析法去处理实际问题时，有几点值得一提：

首先，在阶级社会中，没有一种经济现象不包含着阶级矛盾、阶级斗争，没有一种经济现象不是阶级斗争的一种表现形态或其产物。这里所说的阶级斗争，不仅包括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斗争，而且包括在经济过程本身中、在日常生活中的斗争。在日常生活中，正是这种形式的阶级斗争决定了人们相互之间的经济关系。每个农民所交的每一升租谷，每个帮工所做的每一天劳动，每个集市所成交的每一笔交易，等等，概莫能外。

一般说来，封建地租是吸干了农民的全部剩余劳动的，按照地主的欲望，他还要尽可能地侵吞农民的必要劳动，多多益善。但是，在实际研究中，如果认为每个时代的每家地主都能如愿以偿，那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事实上，有些地主的收租记录证明，某些农民是不交足额定租谷的，所以，他们就被地主诅咒成“頑佃”、“恶佃”等等。所谓“頑”，所谓“恶”，正说明存在着剧烈的阶级斗争。

其次，必须把阶级斗争的形势当作出发点或前提去对经济现象进行分析。许多文献资料都证明了，在太平天国起义军的占领区

内，乃至其周围的边缘地带，农民普遍地少交租谷或根本不交租谷。但是，到了天京失陷以后，许多地主立刻“清租”倒算，有的地主甚至硬逼当时的佃户，代偿久已退佃的前一家佃户的旧欠租谷，或者捏造欠租假账，任意勒索。这些事实说明，在人民掌握国家机器的时候，或在阶级斗争的高潮中，农民的声势上升，地主的气焰下降，因而，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就有所削弱；到了地主重新掌握国家机器的时候或在阶级斗争进入低潮时期，地主便又死灰复燃，对农民进行了更加残酷的压迫与剥削。那种心目中全无国家机器的反作用和阶级力量的对比形势，企图运用纯经济观点去进行所谓纯经济的分析研究，是要落空的。

第三，经济现象的发展变化是一个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人们常常很难一眼就看穿这种过程的阶级实质。这个时候，可以提出一个问题：对谁有利？列宁在指导人们辨别各种观点、提議、措施的政治意义时，就曾提出这个问题。^①我们认为，列宁的这一教导也完全适用于经济现象的分析研究工作。这就是，当人们还看不出某种经济现象的阶级实质时，就应该提出这种现象对谁有利——对哪个阶级有利的問題。从这里去进行分析研究，对于我们认识某种经济现象的阶级实质，会有很大帮助。

三、多次加工，分阶段地总结写作，逐步提高认识水平

全部科学研究进程中的各项工作，都是一个理论联系实际的認識过程。它们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形成一串复杂的連鎖。試拿

怎样收集资料工作来说。人们为了做好这项

^① 見《“对谁有利？”》，《列宁全集》第19卷，第33頁。



工作，首先，必須明确自己的研究需要什么資料的問題；其次，應該明确到哪里去收集資料的問題；再其次，還需要具備鑑定資料價值的本領。而所有這些問題又都包含一系列其他的問題。例如，為了解答需要什么資料的問題，人們就必須首先明确自己所要解決的是什麼問題，而如前所說，這却又要首先掌握豐富的資料，足夠暴露事物的主要矛盾。這就無異於說，要靠掌握資料和運用資料去收集資料和鑑定資料，要靠研究問題去提出問題。

在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著作上，人們最有心得、最有領悟的地方，往往正是在自己心目中存在實際問題，並掌握足夠的資料，力求運用經典著作上的理論原則去解決實際問題的那種地方。這就是說，要在運用理論原則的過程中，去體會理論原則，要在理論聯繫實際的研究實踐中，去學習理論聯繫實際的研究方法。

人們對待科學研究工作不能像對待車間生產那樣，可以按照嚴格的加工程序和操作規程去進行勞動，重複返工，便成浪費。相反的，科學研究中各項工作的相互制約性緊緊地局限着首次“加工”的成熟程度，使得重複返工成了正常的、甚至是經常的事情。當然，科學研究工作也有和車間生產近似的一面。這就是後一階段的工作總是在前一階段的基礎上進行的。因此，人們必須做好思想準備：每做一項工作，儘管估計其必將重複返工，却還要求其盡量完善。

其次，正由於科學研究中各項工作都緊密地相互聯繫、相互制約着，所以，人們就

不該孤立地進行某一項工作，而需要對許多工作統籌兼顧，交叉並進。比方，人們在收集資料時就應該隨時分類排比，隨時加工消化，隨時構思自己的論點，並隨時收集目錄學知識，隨時重溫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著作上的某些原理，隨時回顧前人論著中的某些分歧，等等。這樣做，工作量是很大的。但科學研究的本性就是這樣的，它要求人們在頭腦中反復綜合各種因素，融會貫通，庶幾相互聯繫、相互制約的各項工作得以相互發明、相互促進。

科學研究工作的這種特性，要求我們對材料進行多次加工，分階段地總結寫作，逐步地提高認識水平。

所謂多次加工，就是對原始材料進行粗制、再制、三制、四制等多道加工程序的改造製作以至於完成待用“部件”的意思。當問題複雜而原始材料分量龐大或零碎不成系統時，人們是不可能從原始材料一步就寫成科學論著的。例如，利用零碎殘缺的文字記錄來拼湊複雜的歷史過程，就需要一件一件史事地考訂，一個問題一個問題地去考察。首先作成全面研究所必需的各個“部件”，然後再根據這些考訂和考察的結果去逐步拼湊史事經過的全部面貌，進行理論概括。

所謂分階段地總結寫作，就是在工作進行到一定時期，或思想醞釀到一定程度，或資料積累到一定分量，就系統地分析資料、消化資料、清理自己的思想，作一次全面的總結，並把它們寫下來。人們在研究工作的全部進程中，必須有目的、有計劃地劃定總結階段。到了這樣的時機，就必須毫不遲疑

後



地进行这种总结写作。

分阶段地对资料进行整理、消化与总结，清理自己的思想，动笔写下自己对问题的看法，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所实行的科学的工作方法之一。马克思还在青年时代就已经“把他所读的一切归纳成一定的系统”，“不仅在思考，还要把他的思想表达出来。”^①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马克思叙述他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曾经为了“自己求理解，而不是为了付印”，写过“许多篇专论形式”的“材料”。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那部著作，也正是为的“自己求理解”^②。

科学研究工作，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那样，是一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过程。这是一个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实践过程，也是人们的认识逐步提高的过程。

通常人们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总会对自己的问题逐渐形成某种初步的看法，预想以后达到某种结果。这种看法和预想是否具有真理性，必须通过研究实践去作检验。事实上，人们从事研究的结果，毫无改变地证实初步看法，实现预想结果的事情是很少的，全部否定了的事情也是有的，而绝大多数的情况是那些初步看法和预想结果只具有一部分真理性，另一部分、甚至是绝大部分都由于研究实践中发现前所未料的情况而必须改变提法。我们强调及时地对资料进行整理、消化与总结写作，正是为的及时地进行检验，否定其应该否定的部分，注意发掘实际资料所涌现出来的新问题，锻炼新思想。

在这种锻炼中，人们通过历史过程的具体事实去体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就会更加具体、亲切、深刻；同时，人们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去驾驭历史过程的具体事实，对于历史过程的规律性也就提高了敏锐力、洞察力。

我们特别强调阶段总结中“为自己求理解”的写作，是因为人们头脑中的思维活动是无形的。把无形的思维变成有形的文字记录，就会有助于反复推敲，并且写作本身就是强迫自己进行深入的、全面的、系统的逻辑思考的绝好手段。通常人们在理论学习中若明若暗、似懂非懂的地方，经过写作就会清楚地暴露出来；在历史事实的掌握上，粗枝大叶、若有若无的某些印象，经过写作就会得到澄清；而自己对问题的零星看法，哪些只是无根据的遐想，哪些可能成为抓到关键、值得展开发挥的苗头，也会因通过写作而更加明朗化、系统化。至于在资料取舍上，哪些有较高的价值，哪些根本是废料，哪些还待补充，哪些应该适可而止，通过写作当然也就及时地、更好地得到检验、补充或修正了。

总而言之，分阶段总结，特别是“为自己求理解”所做的写作工作，为下一阶段的资料收集、思想酝酿和理论学习等工作，奠定了提高的基础。那种不肯进行阶段总结，企图收齐资料然后算总账、“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是不利于研究工作的。

① 格拉塞：《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工作方法》，三联书店1954年版，第8页。

②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I、IV页。

